



2011年4月30日5期

总第七十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本期目录

【口述历史】

何兆武口述 文靖整理 从民国走到文革的历史所老人

黄振海口述 林雪整理 “街娃”的文革

邢小群 口述史与文革研究

【蓦然回首】

周孜仁 当年通海闹地震

【书评与序跋】

何蜀 从一个“样板团”看一段大历史——推荐周光蓁著《中央乐团史》

程光 《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前言

李作鹏 《李作鹏回忆录》前言

【文摘】

阎长贵 关于毛泽东不让江青进政治局——读《邱会作回忆录》的一点感想

程光 谈“被利用论”

野夫 童年的恐惧与仇恨

【简讯】

丁东 《文革中的检讨书》在香港出版

穆汀 《李作鹏回忆录》在香港出版

【编读往来】

- 1、肖颖平向任冬林先生致敬 2、魏波称赞“拾荒者”专辑
-

【口述历史】

从民国走到文革的历史所老人

何兆武口述

文 靖整理

文革中最早被斗的侯外庐先生

1952年，我到西安的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今陕西师范大学），在历史系里教了四年书。当时的校长是侯外庐先生，不过他是校长，我是三十刚出头的年轻教师，中间差了好几级，没有直接接触。1956年的时候，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优待知识分子。我还记得当时给每个教师发个优待证，比如进理发馆，人多的时候可以先给你理——其实这些都不太必要，不过我们过去一做什么就做得挺邪乎、挺极端的。

在党的号召之下，科学院集中全国好几百个知名科学家，用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定了很大规模的计划，即《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足足一大厚本，非常详细。各个研究所都在招兵买马，历史研究所请陈寅恪先生做所长，陈先生不就，于是请陈垣，还请了郭沫若。陈垣八十多岁了，只能是挂名，郭沫若以中科院院长的身份兼任历史所所长，也是挂名。于是又调了两个副所长来，一是北大历史系的向达，另一位就是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侯先生同时兼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的室主任。当时大家确实想按《十二年科技规划》发展，所以各个所都不断地往里调人，经人介绍，我从西北大学调入中科院历史所，成为侯先生的助手之一。

侯先生年轻时就服膺马克思主义，20年代在北京师范大学念书时上李大钊的课，深受其影响，从此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留学法国专门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着手翻译《资本论》。就我所知，他是最早翻译《资本论》的人。侯先生的外文并不怎么好，不过在这一点上我的看法和许多人不同。现在有一种偏

差，以为外语通就“一通百通”，不过我不迷信外语学院。翻译的事情，第一重要的是了解专业——不要说外文，中文也一样。比如学古代汉语的，让他写篇文章谈谈人民币升不升值，他能写吗？语言不能代替具体专业的知识，这和中文好不好没有关系。

侯先生从法国回来后，知道已经有人在译《资本论》了，于是就停手，并把自己的译文递给对方。侯先生的风格非常之高，其实他译也没有问题，一部经典著作可以有不同的翻译。比如老子的《道德经》，现在国外有好几十种译本，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再如歌德的《浮士德》，这本书我接触过好几种不同的英译本，每个译者都有自己的风格，有的句子非常长，看起来很别扭，但真实再现了原著销魂夺魄的写作精神，有的译得非常漂亮，却总有点远离原文表达意境的味道。侯先生的中文大家觉得很别扭，不过《资本论》的原文就不是很流利的，所以对有些“评论家”不顾原文风格一味要求文风流畅，我总觉得不太合适。

回国以后，侯先生在哈尔滨的法政大学教过一阵书，后来又在北平大学的法商学院任教。平大法商学院的历史是这样的：民国初年，北京一下子成立了许多专科学校，有法政大学、医科大学、工业大学、农业大学、女子大学等等，总得有八九个。国民党北伐以后，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就把北京所有这些专科学校合并成一个“北平大学”，分别叫作“平大工学院”、“平大农学院”等等，但实际上还是独立的。当时的很多名牌学校，包括北大、清华，教师都是正经八百的学院派，或者说“资产阶级的学院派”，倒是那些差一点的，特别是一些私立大学，政治上的要求不是很严格，真正成了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场所。比如中国大学，那还是民国初年孙中山创办的一所私立学校，就在现在教育部的地方（原郑王府），陈伯达就在那里教书。平大虽然是公立的，但因为原来都是专科学校，水平差一些，不同思想的教师也比较容易进，所以那里就成了左派的天下。特别是法商学院，那里左派教师集中，学生多是左派，所以法商学院也是最闹事的。

侯先生来北京，就在平大法商学院教课，虽然不能非常公开，但实际上就是教马列主义。1932年12月那次抓了三个教授，除了侯先生，还有北大的许德珩、北师大的马哲民，罪名好像是“危害民国”，还判了刑，闹了很大一阵，

当时叫做“许侯马事件”，侯先生是在第二年 8 月才被释放。当时有个传统，凡是名人被抓都会有人出来保，包括杨开慧，蔡元培等好几个国民党的元老都打电报给湖南省长何键，要求保她。但何键很狡猾，收到电报就先把人给枪毙了，然后回复说：可惜电报收晚了云云。不过过去确实有这个传统，侯先生他们也被保了出来。

抗战时，侯先生到了重庆，是左派文化领导人之一。抗战初期，苏联援华是最多的，包括飞机、军火、空军志愿者等等，远远超过美国，所以国民党也拉拢苏联，特别派了立法院院长孙科到莫斯科去。孙科当时算是国民党里的开明派，回重庆后办了一个中苏文化协会，侯先生在里边负责编《中苏文化》。1941 年新四军被解散，当时中共的政策是让所有人潜伏到下层去，广交朋友，暂时隐蔽。那时候我在西南联大作学生，学校里忽然跑了一大批人，平常比较出头露面的都纷纷离开，总有七八十个的样子，差不多占了学生人数的二十分之一左右，比如跑到云南乡下等等，免得被抓。侯先生还在重庆继续办杂志，因为挂了孙科的名字，也是对左派进步杂志的一个保护。抗战初期，郭沫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厅长，是左派的文化领袖，他们经常有活动。有一次开座谈会，张申府提出来要马克思、罗素、孔子三结合，侯先生当场批了他一阵，我们都是《中苏文化》上知道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压制得更厉害了，对共产党下了讨伐令，一部分“送回延安”，一部分就给抓起来，许多进步人士无法立足，先后辗转去了香港，其中包括郭沫若、茅盾等等一些名人。侯先生在香港从事左派文化活动，在达德学院（一个规模不大的左派学校）里教书，一直到 1948 年东北解放，香港的左派人士纷纷回到解放区，侯先生取道东北回了北京，在母校师大做历史系主任。

解放前，侯先生就出了几本关于历史研究的书，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等等，还有就是《中国思想通史》（共五卷），找了几个人一起合作，不过第四卷没有写成，那也是内容最多的一卷，后来拆成了上下两册。解放后，侯先生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参加了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当时还没有人民代表大会，政协是唯一的民意机关，郭沫若、侯外庐等与党组织的关系长期隔绝，解放初期的身份是民主人士，直到“反右”以后才公开党籍。1950 年，侯先生被调到西北大学做了几年校长，一

直想要继续把这套书完成，直到 1955 年任历史所副所长，思想史研究室完全由侯先生负责，实际上也是专门为他成立的，专门安排几个年轻人做助手，特别是《中国思想通史》最后两卷太长了，从宋一直到清，基本上就是大家在侯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是迄今为止最大部头的，也是最早的一部最完备的中国思想通史。

不过当时有个特点，大家都不务正业，本来一年 365 天可以真正搞出点什么，但政治运动一来就压倒一切，正常工作经常被打乱。“反右”一反就是一年，天天批右派，接着就是“大跃进”，大家都去大炼钢铁，本来所里招研究生要求读经典著作、学两种外国文，要做论文，可哪有时间呢？再后来是下乡搞“三史”（家史、村史、社史），1959 年我们就到河北卢龙县去修县史。三年困难时期稍微好一点，可能是大家吃不饱，都没劲儿闹了，不过杂事依然很多。比如国庆天安门大游行，扎花车一个月，排队练习齐步走一个月，而且年年如此，一直到林彪出事那年才停下来。诸如此类的事情非常之多，反而成了最主要的任务。侯先生自己是比较主张搞业务的，可是总被各种政治任务打断，动不动就全室的人都走空了，所以时常他也流露出一不满意，说：“上级的任务，该顶就是要顶。”记得有一次纪念辛亥革命多少周年，组织大家写文章，侯先生说：“这个文章我们写不了，这得让党中央去写。”

侯外庐先生首先是一个学者，主要的兴趣在学术上，虽然挂了副所长的名义，实际上主要就负责我们研究室，一心只想完成他的那套《中国思想通史》，其他活动很少过问。历史所也算比较照顾他，对我们室的干预是最少的，所以到文革时候也成了一条罪状，说侯先生搞“独立王国”，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党内民主人士”。而且侯先生有个特点，比较执着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典，凡事一定要从马克思原典里找根据，有点儿原教旨主义的味道，这是他从年轻时起一贯的路数，我给他做助手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工作就是帮他找德文原典。从优点一方面说，这证明侯先生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但从缺点一方面说，就有点书呆子气了。政治是讲现实的，而不是纯逻辑的，真实的政治有它的“灵活性”，需要“理论联系实际”，按林彪的话就是要“活学活用”，可是侯先生往往把政治上的事情当学问来研究。比如上面让批吴晗，那是政治的需要，批就是了，可侯先生一定要找原典，查一查马

克思对清官、赃官是怎么定义的。再比如，上面号召搞人民公社，“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但马克思并没有提过要搞人民公社，所以侯先生从来不大就这方面写文章，不能“与时俱进”，甚至扯后腿，这也是他吃亏的地方。

刚解放的时候，史学界有“四老”之称，指四位老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另外还有一种“五老”的说法，就是再加一个吕振羽。抗日战争时期，吕振羽做过刘少奇的秘书，但后来也是最早出问题的，1963年把他抓起来，再往后就不提了，只剩下“四老”。不过这四位老资格的马克思主义者，文革中无一幸免，都没能逃过这一关。翦伯赞自杀了，侯外庐瘫痪了，范文澜做了五次检讨，不顾“实事求是”的原则，竟然嘱咐帮他做检讨的助手说：“说得越过分越好。”郭沫若没有被大规模的明批，实际上他的压力也很大，一个儿子被打死、一个儿子自杀，而且他公开做自我检讨，说：“现在看起来，我以前写的书都该一把火烧掉。”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否定过头了，他是在否定自己，还是否定自己的事业？难道他真那么想？

侯先生是历史所第一个挨整的，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有一次把他整得很厉害，说他是叛徒。当时定个叛徒很简单，凡被国民党抓起来过的都被视为叛徒，因为当年国民党抓人，有些找不出证据的也给放出来，只要写个悔罪书，表示要信仰三民主义等等，或者有的人还写：“本人一时糊涂，误入歧途……”这都是无奈之举，不然怎么能让你出来呢？但解放后都成了罪状。而且有一件事情，现在说起来都当笑话了。有一次抄侯先生家，本来准备下午去，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让中央戏曲学院的红卫兵抢先一步，把好东西都抄走了，结果我们所的这帮人去了以后什么都没捞到。这种活动我是没有资格参加的，不过因为我们室的王恩宇是红卫兵的头儿，我听见他给戏曲学院打电话，说：“我向你们提出最严重的抗议，你们趁火打劫！”第二天侯先生来上班，我看见会计室的女同志借给他五十块钱，说是生活费，据说他家里已被洗劫一空，连打火机都给抄走了。

侯先生本来身体很好，我想他再工作十年也没有问题。1968年，有一次斗了他一整天，结果脑溢血，回去就瘫痪了，虽然后来活到八十四岁，可他最后那七八年躺在床上不能活动，实际上就是一个废人了。70年代初我们从干校回

来，那时我还顶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记得有一次去医院看病，碰到所里一位老先生，大概是胡厚宣，问我身体怎么样。我说还好，就是腰疼，他说：“我看你的样子还好，可是你看侯先生，人都垮了。”我回答说：“我跟侯先生不一样，侯先生是‘百万富豪’，一破产精神上受不了。我就有一块钱，拿走就算了，无所谓。”

历史所差不多两百人，侯先生是第一个挨整的，只有他一个是反革命，所以压力很大。可是等我被揪出来的时候，全所大概三分之一的人都是反革命，也就不稀罕了。好比一个担子四五十人挑，那比一个人挑，重量上要差很多。而且，侯先生是老马克思主义者、老革命，又是社会活动家、政协代表、历史所所长、国际知名学者，这么多桂冠，一下子破产了，突然变成反革命，让他出来扫厕所，既是一种惩罚，又是一种侮辱。我好比是从一个台阶上摔下来，爬起来还能接着走，可他是从高楼上掉下来的，那怎么受得了？特别是他的信仰、他的理想。从年轻时候起，侯先生就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奋斗了一辈子，结果自己成为共产主义的敌人，这个打击对他太大了，是旁人无法想象的。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好比青年男女恋爱一样，你全心全意地爱她，忽然发现原来是个骗局，如果精神脆弱的话，人会崩溃的。所以侯先生在那天夜里突然发病，一下就瘫痪了。

《中国思想通史》最后总算完成了，基本上是按照侯先生马克思主义原典的那套思路来写的，是他毕生学问的结晶，从这一点上看，应该算是幸运了。本来这套书可以更充实、更深入，可惜大家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不务正业了，并没有侯先生最初设想的那么完美。

“一级研究员”顾颉刚先生

顾先生是五四时候的青年，和傅斯年、罗家伦、冯友兰、俞平伯属同一辈人，胡适虽然长不了他们几岁，但他的辈份高。我爱人 1934 年北大入学上过胡适的课，听她讲，胡适在课堂上非常谦虚，提到他的学生时都称“先生”，比如“傅斯年先生”、“顾颉刚先生”。五四那一辈人和后来我们这辈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第一，他们的旧学或者国学根底都非常之好，像陈寅恪、俞平伯

是有家学的，或者没有家学的，因为整个社会环境的原因，旧学根底也要比我们强很多。如果让我们这一代来反传统还反不了，因为经书全没念过，更不要说背诵，古典的精义全都不了解，反也反不了它。第二，五四这一辈人大都喝过洋墨水，胡适留美，陈寅恪留德、留美，陈独秀留日，名人中只有两个例外，一个顾颉刚，一个陶希圣。

五四运动是爱国运动，但同时又是对几千年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文化的彻底颠覆，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有的。所有的被压迫民族，当他们要求政治解放的时候，都是把自己的传统捧得非常之高。比如希腊独立的时候，极力发扬希腊的文化传统，以对抗土耳其政治、文化的统治。二战时的苏联也一样，极力高扬俄罗斯的传统，把俄罗斯的伟大人物评价得非常之高，比如18世纪的学者罗蒙诺索夫。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就知道，氧气是法国的化学家拉瓦锡发现的，可二战后被说成是俄罗斯科学家罗蒙诺索夫发现的，什么什么都是罗蒙诺索夫的功劳。再比如无线电，那是意大利的大发明家马可尼发明的，结果也被说成是俄罗斯学者的功劳，大概叫波波夫，用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可是中国的五四运动是个例外，中国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极其爱国，但又极其的反传统，或者说，他们以对传统的极力反对来体现他们的爱国热忱，这是很多民族所没有的。

另一方面，五四时的知识分子恰恰又是对传统极其有研究的人。顾先生旧学根底非常好，先后出了七册《古史辨》，后来有一批人跟着他的路数成为一个有势力的学派，叫“古史辨派”。顾先生有一个基本论点，认为中国的古史，比如三皇五帝等等，大都是后人伪造的，而且越造越多，层层附加，把古史演说得越来越系统，其实都是假的。钱玄同也是疑古派，把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叫“疑古玄同”。顾先生做学生的时候喜欢看戏，从戏里得到很多关于历史演变的启发，而且对民俗开始有了兴趣，这一点功不可没。过去的历史学都是眼睛死盯着正史，只拿出经史子集来翻，可是顾先生看到了现实生活，比如婚丧嫁娶等等，所以他对近代的民俗学有非常大的贡献。

顾先生很早就有了名气，抗日战争前我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就在《中学生》杂志里看他的启蒙文章，比如他写明末清初的三大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让我大开眼界。当时他是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解放后顾先生在自我检讨

里说，当初他觉得北大矛盾多，卷进去比较麻烦，而燕京大学是外国人的学校，少有人事的复杂关系，受政治上的影响也小，可以安心做学问，所以他选择了燕京。实际上，顾先生也是个很爱国的人。当时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驻扎北京的是冯玉祥的 29 军，广大官兵还是非常爱国的，但他们的头头宋哲元却是个动摇分子，总想在日本和国民政府的夹缝中间做个土皇帝。顾先生亲自到 29 军做工作，写了许多宣传抗日的通俗作品，当时很少有其他大学者像他这样，这是很了不起的。

抗战的时候，顾先生在重庆办了《文史》杂志，宣传爱国，宣扬中国的历史文化。当时凡是名人，无论文化界、学术界、教育界，甚至于实业界，凡做出一点成绩的，必然都会和政治挂钩，这是必然的。顾先生到了后方之后，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秘书长朱家骅有联系，有几件事情对顾先生的名誉是有影响的。第一件事，国民党当时要定一个“工程师节”，因为顾先生对民俗有研究，少数民族崇拜大禹，他考证出农历六月六日是大禹的生日，所以就把“工程师节”定在这一天。但是在此之前，他曾经有过一个重大发现，说大禹其实是条虫子。那时候我正在西南联大做学生，有一次听中文系主任罗常培讲课，说：“顾先生真有意思，考证出大禹是条虫子，又说六月六号是大禹的生日。虫子还有生日？”

这算小事了，另外还有一件大事。那时候把蒋介石吹捧为民族英雄，朱家骅出了个主意，想要向蒋献九鼎，那是中国古代赞美功德最隆重的礼节了，于是请顾颉刚写颂辞。记得政治系张奚若先生在课上说：“竟然有人还要献九鼎，也不知道是什么时代了，幸亏那个被献的人还有点自知之明。”据说后来蒋介石自己拒绝九鼎，当然也就没有献成，但是无论如何，这件事对顾先生的声誉是个打击。好像他还有个声明，说九鼎的铭文不是他写的，而是他的一个学生，而且我还听说，铭文实际上是他的学生刘起釞写的。刘先生比我长四五岁，也是湖南人，后来在历史所。不过这都是传闻，究竟是谁做的已经不可考，不过我觉得，对于过去的事有些不必过于深责。文革时候给江青的称号是“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谁没有歌颂过她？当时的环境就是那样，又何必苛责别人？

1948 年，顾先生以国大代表身份参加的总统选举，后来成了他的污点。我

不知道顾先生是不是参加了国民党，不过事实上认为他是国民党——就像郭沫若一样，组织关系是一回事，实际上已经是共产党了。其实他那时候不该卷到政治里去，李白有诗：“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一个人混日子就是了，最好是无名，只不过顾先生大名鼎鼎，盛名之下或许身不由己。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解放前，顾颉刚在上海办了一个书店，叫“大中国图书局”，结果解放以后他的成分就变成了资本家，这个很糟糕，对他后来还是有影响的。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选院士有81人，郭沫若虽然是左派，但也在其中。胡适说：中研院看重的是学术，只要对学术有贡献就应该选上。解放以后，中央研究院改为中国科学院，科学院的第一批学部委员有233人，相当于院士了，而留在大陆的原中研院的那批院士中只有两个没有入选，一是植物学家胡先骕。胡解放前做过江西中正大学的校长，反对白话文，被认为是个老顽固，又是国民党，所以没有要他。另外一个就是顾颉刚，我想也是政治的原因。再比如冯友兰，以前他是一级教授了，是国民党主席团里的一员，政治地位相当高，所以刚解放的时候一度把他连降三级，变成四级教授。

因为顾先生是大名人了，受到周恩来的保护，把他从上海请到北京来，就在历史所工作，并且点名请他主持标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那是个非常浩大的工程，请了全国几十位大专家，传说这个任务是毛本人交待的。毛对中国的古书非常有兴趣，对《资治通鉴》当然尤其有兴趣。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有个非常强的班子，几个当时最有名的史学家帮他一起完成，记载的都是历代的政治斗争，大概这个对毛是非常有用。顾先生本来想把《尚书》整理出来，因为“五经”里边《尚书》最为难读，都是古代的官方文献，佶屈聱牙，词句非常古奥，是问题最多的一本。顾先生想把它加上注解，翻译成白话，不过总是时干时停，不断地有任务分派，所以始终没有完成。

当时历史所的一把手是党委书记尹达，他是历史学界左派的一面旗帜，而顾先生是右派的一面旗帜，意见不能相融，所以两人关系总也处不好。不过我觉得，尹达在一些地方做得太小气，就好像剧团演出一样，把梅兰芳、马连良等等五湖四海的名人都网罗来，不也壮大了自己的声势？何必管他的政治立场如何。1957年“反右”，到处都在贴大字报，顾先生也写大字报做自我检讨，

一贴就是三十六张，整个一面墙都贴满了。我只记得里边有几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反右”以来看到许多熟人成了右派，我是漏网之鱼。他竟自命“漏网之鱼”，我觉得挺好笑的，果然，到文革的时候也把他揪了出来。

顾颉刚先生喜欢写日记，而且写得十分详尽，这是清代朴学家的作风，结果抄家抄出一大摞，有解放前的、解放后的。作为一个大名人，总免不了发牢骚，日记里随便找出一句话就可以上纲，于是历史所成立了专案组，说他是“反共老手”，举行声势浩大的批斗会，“打倒顾颉刚”、“打倒顾颉刚”，众人齐呼，声震屋瓦。幸亏历史所的运动还文明一点，没有动手，不然打了也是白打，恐怕他也吃不消。比如有位老先生叫蒙文通，是四川大学的教授兼任历史所研究员，他有一句口头语，看到某某人的做法觉得不应该，就说这个人该“打屁股”。于是文革的时候在四川大学斗他，就真把他的裤子扒下来打屁股。那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还要当众受这种侮辱，加上他身体有病，就含冤去世了。另外，斗牛鬼蛇神的时候有个“传统”，每个人都要自动报名，比如问到俞平伯，问：“你是什么人？！”答：“我是俞平伯，文学所的研究员。”“什么罪状？！”“我写了很不好的书。”“你写了什么书？！”“我写了《红楼梦研究》。”于是就给他戴一顶牛鬼蛇神的帽子。批斗顾颉刚的时候也是这样，问：“你是什么人？”顾颉刚答得很有意思，说：“我是历史所的一级研究员。”当时历史所一级研究员只有两个人，一个侯外庐，一个顾颉刚，但那种场合还扬出自己的“一级”身份，总不太合时宜，所以被大家传为笑谈。

一直到文革结束，顾先生才算翻了身，做了人民代表。一次我和历史所的何高济聊天，开玩笑说：“顾颉刚向蒋介石献九鼎，怎么能做‘人民代表’呢？”何高济说：“正因为他献了九鼎，所以他能代表人民。”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们就是要让台湾看一看，向蒋介石献九鼎的人还能代表人民，这是多大的号召力呢。”这一点我没有想过，或许出于统战的需要？也并不是没有可能。顾颉刚晚年大概一直很不开心，八十多岁去世了。

关于顾颉刚一生的功过，应该说他首先是爱国的，而且十分的爱国；五四时反传统有功劳，领导了一个疑古学派，对于神圣的传统大胆怀疑，虽然也有过了头，对古代否定得太多，但对思想解放有很大的贡献，不失为学术界的一个重要领袖。而且顾先生是个很有眼光、多方面的大学者，开创了民俗学的先

河，虽然晚年的社会情况有所变化，只做了些标点古书的文字工作，但毕竟也很重要。另外还有一点，顾先生和胡适一样，也喜欢培养青年，侯仁之、杨向奎、杨宽、史念海、谭其骧等等都是他带出来的。

关“牛棚”也满不在乎的谢国桢先生

谢先生的专长是搞南明史，是当代的权威之一，晚年也着力于汉代社会史，同时代的南明史专家还有柳亚子、朱希祖等人。第一次见到谢先生是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虽然偶有相遇，只是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毕业后，他到南开教书，我去了北京图书馆工作。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差不多同时，我们都调到了历史研究所，他在明史室，我在思想史室，但并不熟。直到1968年，我和顾颉刚、谢国桢两位老先生同在一个“牛棚”里关了几个月。

顾先生是史学界的元老，我中学时候就读他的文章，差不多是太老师了，谢国桢也是我的前辈，三个人同关在一间小屋子里，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请教机会。那时候，一般关进牛棚的就不许回家了，但是顾先生年老体衰，名气也大，所以晚上准许他回家住。每天早晨，他夹一个布包回牛棚，中午时候打开，里边是一个烧饼、两块豆腐干，我给他倒一碗水，这就是他的午饭。可是顾先生从来都正襟危坐，也不看书，也不说话，愁眉苦脸的一言不发，我们也不好打搅，结果白关了几个月也没说上几句话。谢先生倒非常豁达，关进牛棚也泰然自若，好像满不在乎，有人看守就低头学习“小红书”，没人时就东拉西扯，谈笑风生。当时我还不到五十，算是 *late forties*（四十岁的后期），谢先生大概比我大二十多，没有人的时候，我就偷着跟他胡扯，也算苦中作乐。

谢先生是老清华国学研究院出身，毕业后做过几年梁启超的秘书和梁家的家庭教师。清华国学研究院前后办了三年，一共毕业了不到一百人，至少有半数以上都成了知名学者，谢先生是其中之一。1909年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成立，1925到27年梁启超兼任馆长，谢国桢就在那里工作。现任馆长任继愈先生曾对我讲，图书馆刚成立的时候，一个月的经费总共才有两千块钱，可梁启超一个人的工资就有一千。谢国桢在京师图书馆研究金石和古代史，工作悠闲，比较适合他。没过多久，傅斯年介绍他去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历史系

做专职讲师，每月二百八十块大洋，待遇非常优厚，对于一个刚毕业没几年的青年来讲，非常了不起了。因为傅斯年和他的班子都是北大的，中央研究院设在首都南京，南方的史学界是中央大学柳诒徵弟子的地盘，傅斯年就希望有自己的人打进去。可是没想到，谢国桢去了以后和那些“柳门弟子”关系处得很好，根本没起到作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北京沦陷，大家都往西南跑，北大、清华、南开就在长沙组成了临时大学，谢国桢也去了那里。不过，谢先生不属于为国为民的热血青年那种人，而是喜欢吃喝玩乐，是老一辈名士风流公子哥的禀性。到了长沙生活上不习惯，想家了，于是别人都往内地跑，他却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图书馆。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也分家了，一部分人带着图书到昆明，于是谢先生就转到大中银行工作。就我的印象，旧社会对商人一般是看不起，所谓“士农工商”，把商人排在最后，认为他们唯利是图，整天想着赚钱。只有银行界的人喜欢附庸风雅，写字、绘画、玩古董，舍得花钱，也需要一些学者参与，或者挂名。此前，谢国桢写过一些东西，已有了名气，其中《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鲁迅在文章里都有推荐。过去我们常说，孔子是至圣、孟子是亚圣。解放后，毛泽东被看作至圣，有一种说法是把鲁迅作为亚圣，所以，能被鲁迅推荐是很了不起的荣誉，这让谢先生得意了一生。

谢先生因为什么问题进牛棚呢？1946年，他的父亲死了，谢先生回河南老家奔丧，途经华北大学时见了范文澜。当时范文澜是华北大学副校长，给了谢先生一笔钱托他买书，不过他在用这笔钱的时候吃了回扣。回扣在旧社会里是公开的，相当于今天的劳务费，是很自然的事情，一般不算贪污，结果解放后被人揭发了，说他贪污解放区的血汗钱。而且，因为他在日伪占领区工作过，虽然不在伪政府里，但也被定为文化汉奸。他自己倒无所谓，汉奸就汉奸吧，贪污就贪污吧，一概供认不讳，从不争辩，也从不抱怨。当然这样也好，不过每个人的反应不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挺过来。西南联大化学系有一位老师叫高崇熙，教分析化学的，也是老清华出身，年龄和谢先生差不多。高先生要求学生非常严格，而且他实验室的所有药品都只编号、不写名称，所以只有他知道是什么药，别人没法用。高先生解放后仍在清华，“三反”的时候反到他头上，传说是因为贪污了化学系的药品，结果就自杀了，大概高级知识分子里，

他是自杀的第一人。

谢先生的祖籍好像在江苏，父亲在河南做过知县，所以他从小生长在河南，一嘴的河南话。牛棚里无事可做，又没人管的时候，谢先生就跟我扯七扯八。有一次谈到听戏，他跟我讲：“赤壁之战那年，诸葛亮二十七岁，周瑜三十四岁。”我没仔细研究过他们的岁数，不过我知道京剧里诸葛亮是老生，周瑜是小生，正好完全相反。聊得正欢，有人在外面大吼一声：“好好学习！”于是我们赶紧低头，继续学习“小红书”，但不一会儿又聊了起来。又一次，谢先生讲起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做学生的事，说有一年夏天的晚上，大家围着梁启超一起喝茶乘凉，有个同学问：“梁先生，您是个学者，怎么就干起政治了？还干了一辈子？”一句话引开了梁启超的话匣子，就讲起他是如何如何干了政治等等，一讲就讲到了第二天天亮。我觉得那些材料太宝贵了，要能记录下来，该是多么可贵的史料，于是就老怂恿谢先生写下来，可他始终也没动笔。

谢国桢是喜欢玩乐的那种人，其他的好像一概不放在心上。和他在一起总让人觉得开心，也很放心，至少可以暂时忘掉一些苦恼。比如他一生好吃，牛棚里经常大谈特谈什么东西好吃，我问他：“您吃了一辈子，到底哪顿吃得最好？”他说：“啊呀，要说最好的，就是1933年的那一次。”那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到中国来，傅斯年是当时中研院史语所的所长，在北海仿膳请客，谢先生也参加了。那一顿吃得怎么好呢？他说，仿膳是按照宫廷的方式，上的都是宫廷的菜，而且每上一道菜都换一道酒，喝不同的酒配不同的菜，所以上了十几道菜就换了十几遍酒，怎么怎么好极了，说得眉飞色舞，让我听得也要流口水了。后来我又问：“您说现在什么东西最好吃？”他说西单商场有个峨嵋酒家，里边的干烧鱼最好，于是我说：“等什么时候回了北京，我一定请您吃一次干烧鱼。”果然，后来回北京以后有一天他来找我，我家离西单商场很近，就请他去峨嵋酒家吃了一顿干烧鱼。我倒没觉得真就那么好吃，不过，只要他喜欢就行。

文革时候，谢国桢被抄家、被斗过好几次，都是莫名其妙的。有一次让他抄大字报，他抄错了一个字，这在文革是很严重的问题，等于歪曲党的政策，立刻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到他家里，把谢师母也揪出来一起斗。而且，现在一些人写回忆录也不说真话了。比如文革开头时候，有一天命令谢国桢和顾

颌刚去搬砖，两个人年纪都很大了，而且谢先生又胖，行动特别不方便。我看到一篇回忆录，说谢国桢这个人很幽默，一边搬一边说：我们俩像不像《空城记》里扫城的老军。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文革最初的阶段空气非常紧张，随便哪句话拿出来都可能成为罪状，在那种压力之下，怎么可能公开地讲笑话？

还有一次去抄他的家，抄出两个神主牌。一般旧社会家庭都有这种东西，用木头雕的一个小阁子，里边放个牌位，前清时写的是“天地君亲师”，到了民国改成“天地国亲师”，左右两边写上祖先的名字，“先考××”，“先妣××”，放在正屋里，逢年过节都要磕头祭拜。这在过去是很普通的东西，抄谢先生家抄出两个，于是斗他的时候，就叫他一手举一个站在主席台上。因为当时我已经戴了反革命的帽子，所以坐在最后一排，旁边就是工宣队的领导。谢国桢本来很胖，年纪又大了，还举着这么两个东西，晃晃悠悠的，样子确实很可笑。那个工宣队的领导就用胳膊捂着脸，咯咯咯地闷笑个不停，这一点让我很反感。你是工宣队的领导，是不是认为应该这样做？如果应该，那么这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有什么可笑的？如果你认为就是要演滑稽剧，那你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最大的侮辱。用这样的人来领导一场大革命，简直是荒唐。所以有时候我想，难道这就是我们工宣队的水平？也许中国的工人阶级还不配实现伟大领袖的伟大理想。

最后还有一件事情不得不说。斗谢国桢的时候有一条罪状，是说他坐公共汽车不买票，被售票员抓住了，于是给他画了一张画，在一个大钱孔里画上他的头，讽刺他一头钻到钱眼儿里去了。我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再说偶尔忘记了，或者因为车上人多没有买到票，都情有可原。1982年谢国桢去世，遗产有四万块钱，大概比现在的八十万都不止，谢国桢遗嘱将四万元遗产全部捐献，据说他的女儿对此都不满意。我不知道一个将毕生积蓄都捐给国家的人，怎么会计较五分钱的车票？难道他真的吝啬？谢国桢从没辩解过。

【口述历史】

“街娃”的文革

黄振海口述

林 雪整理

整理说明：黄振海生长在成都小街深巷中，成都话称为“街娃”。现在，他是有些名气的画家了。文革一开始，他就成了“反革命”，和四个同学差点被送去“劳动教养”，他后来成了成都市锦江中学八二六派《新锦中公社》的小头目，几乎经历了成都文革中所有的大事件。由于所处的地位和这些经历，他对文革的感想和思考也和主流意识及上层人士颇为不同。这里整理出来的仅仅是运动初期部分。以后的内容还待陆续整理。

黄：我认为文革的意义对于不同的人群是有区别的。也许在有的阶层，文革的目的就是争权夺利，可是在我们平民眼里，特别是在我本人，是因为不得已被牵连其中。文革一开始就整到了我们老百姓的头上。那时候我还是一个 15 岁的孩子。

这要从对工作组的态度变化说起。我们学校的工作组，刚开始是来搞“四清”的，叫做“四清工作组”。住在学校里的一栋单独的房子，不轻易与普通师生接触，很神秘。在我们的眼里，他们每个人都是代表党的，是很优秀的，全校的师生对于他们都是很尊敬的，敬而远之。到后来，“四清工作组”成了“社教工作团”，再后来教室的喇叭里宣布，他们成了“文革工作组”，开始领导学校的运动，这些成员才走出来和大家见面，在他们的周围，立即团聚了一批积极的“革命师生”。开始他们还只是照本宣科读报纸，动员写大字报，批判北京的“三家村”啊什么的，后来大字报的矛头就引向了学校的老师，特别是有一批 60 年代参加过“二师闹学潮”的老师。听说其中领头的被逮去坐牢了，剩下的留在学校“内控”，工资每个月只有十几元，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被重点监视。

我们和所有的人一样，从小都是绝对听党的话，党说谁好谁就好，说谁坏谁就坏。现在工作组就是党的代表，叫我们批判谁就批判谁。记得正是 1966 年的 7、8 月，那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都已经发表多时了。各个学校的大字报都很多了，墙上贴不下就在树与树之间牵上绳子，把大

字报挂在绳子上。因为社论上说要批判“专家”、“学者”、“反动权威”嘛，我们也写，都是批判老师的，不过也找不到什么“钢鞭”内容，不过是某老师讲“三角函数”的时候不严肃，扯到“韩包子”上去了之类的鸡毛蒜皮。这类事情写多了就会觉得没意思，于是就跑出去看别人怎么写的，尤其是九眼桥的四川大学，那里不但大字报多，而且还激烈辩论，很刺激，觉得有水平。看了几天回到学校，风气就变了：一直都很要好的四个同学，突然成了“反革命”。

林：四个什么样的同学？

黄：同学陈，和我是邻居，从幼儿园开始就同学，他的个性虽然有点“牛”，其实是个老好人，他爸是街上卖豆花饭的，做小生意，后来不知道怎么就成了“国民党的连长”，反动军官。同学康，他的父母解放前都是大学生，只是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解放后一直抬不起头，父亲只好去拉架架车，康本人有点野，喜欢打架，但是因为父母的成分不好，言谈也很谨慎，绝对不说过头话。同学谢，父亲好像在“伪军队”当过文秘之类的，写一手好字，虽然成分也不好，但是很听党的话，算起来是最老实的。还有同学许，他爸解放前与其他三个人合买了一辆汽车做生意，算起来只有一个轮子，却因此划成了“不法资本家”，但是许本人成绩好，不调皮，是个十足的好学生。他们之所以成为“反革命”，是因为蹭坏了一张大字报。

林：那大字报很重要吗？

黄：大字报的标题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揭露喻春芳。喻春芳是学校里的一个党员老师，工人出身，平时穿着朴素，有些不苟言笑。或许就是她的“不苟言笑”让人不舒服，运动一来就成了攻击的目标。那时候虽然省委已经要求所有的大专院校一律“停课闹革命”，中学生也开始写大字报，可是课还是要上的，而且还上晚自习。“闹革命”也不耽误调皮捣蛋，那些天他们四个人发现班上一个刚刚转学来的男生，居然和一个漂亮女生好上了，每天晚上下了自习课都要去送她。几个家伙就躲在教学楼下的墙根里，准备“跟踪追击”，听听他们说了些什么。没想到挤来挤去的，就把贴在墙上的那张大字报蹭掉了一只角。第二天就被一个“阶级斗争觉悟高”的高中生发现了，认为这是“撕毁革命的大字报”，是个“反革命事件”，

就去向工作组汇报，而且把场面形容得很刺激：昨天晚上，看见有几个黑影在墙角晃动，今天早上就发现大字报被撕毁了！

当时各个中学的形势已经很紧张。我们城南片区的锦江中学、盐道街学校、十六中、簧门街中学、南虹路等中学的工作组，属于同一个工作大队。其中十六中的工作组，搞得最红火，把一个叫钟兴泰的老师打成了“牛鬼”，钟老师虽然断了一只胳膊，但是很能写，不断写出大字报来反驳对他的攻击。十六中还揪出了三个“反革命”高中生。这三个人的名字我也记得很清楚：邹德义，吴久高，龚述仁。三个都是好学生，都是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物。他们此时写大字报，不过是学着清华附中的那些红卫兵，说工作组压制革命师生，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学校的运动死气沉沉……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是受到毛主席支持的，所以他们写的大字报理直气壮，被工作组认为“非常嚣张”。记得我们城南片区所有学校的学生，都到十六中去参加斗争这三个“反革命学生”的大会，把那个大操场塞得满满的。

林：在这样的气氛下，各个中学都会“攀比”着揪反革命，锦江中学这个“撕毁革命大字报”的事件，肯定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黄：就是。那天早上我一进教室，就有人悄悄告诉我：他们几个人去撕大字报，遭了（注：川语，出事了、倒霉了之意。“遭”读二声）！我一看，所有的同学都自觉地和他们“划清界限”，几个人孤零零地缩在角落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一看我来了，都来向我诉苦。我开口就问：工作组是什么态度？

林：工作组的态度很重要。

黄：当然。工作组代表党嘛。毛主席说了：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现在群众是没法相信了，就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党的身上了。工作组开始的确没有表态，只是和颜悦色地把他们找去谈话。几个人还没有想到大字报的事情有多么严重，只是想抵赖“跟踪”的事情，因为这事说出去很不光彩，甚至有些“低级趣味”，所以一口否认。没想到工作组很快翻了脸，拿出了“罪证”——就是那块被蹭掉的大字报，紧接着号召全校的“革命师生”立即起来，背靠背地揭发，“狠狠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我

回学校的当天下午，就开他们的批判会。每个教室里都安了小喇叭，各个班都坐在教室里听，很多平时要好的同学都成了“革命群众”，在喇叭里揭发批判这几个人的“反革命言行”，把平时开玩笑的话都拿出来上纲上线。比如有人揭发，说一次他们几个去和建筑工人捣乱，扔石头，是“极端仇视工人阶级”，而且还有人出来“作证”，当证人。我觉得太无聊了，当时就说：证人是“培养”的嘛！

林：你为什么不怕？

黄：怕什么？在我们“街娃”中间，“义气”很重要，而且不知道天高地厚。我绝对不相信他们是什么“反革命”，所以也绝对不会和他们“划清界限”。再说了，我刚刚在外面看了两天大字报，马恩列斯的语录学了一大堆，还有很多“新名词”。他们向我诉苦，我根本就不听，用不着听，因为无论是中央发布的哪篇社论，都说这次运动的重点，一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二是“盘踞在思想战线上的大量的牛鬼蛇神”，和我们中学生有什么关系？这明明是转移斗争大方向嘛。

林：你的“勇敢”管用吗？

黄：我算老几啊。我眼睁睁地看着几个同学不断被政治老师找去“分别谈话”。这里要说明的是：运动一开始，政治老师就成了一个特别受到重用的群体，他们坚定地站在工作组的周围，随时都准备听从召唤，出手揪人，令其他老师都“退而远之”。找同学陈“谈话”的是一个姓马的政治老师，也年轻，平时还和我们一起开玩笑，可以说是真正和我们“打成了一片”，很受学生拥戴的一个人。可是现在马老师把同学陈喊到一边去，正起一张脸不知道在说什么。突然，我们看到同学陈惊恐地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看着马老师往后退：呜呜呜……你狗日的才是反革命！后来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马老师层层推理，步步紧逼，三句话就把他装进了圈套，分明是想逼他自己把自己说成反革命。同学陈本来是个有些羞涩的男孩，他本来是很崇拜马老师的，此时突然放声嚎哭，既是因为冤枉，更是因为突然发现自己被敬爱的人“骗”了，他所尊敬的那个“好马老师”没有了，他信仰大厦的“一只角”崩塌了。从此之后他是谁都不能相信了。直到现在，同学陈都会时不时突然地“嚎”几声，弄得大家莫名其妙。每当这个时

候，我就会想起当时的情景。可见这件事情对他的打击之大，伤害之深。

我当时气坏了，说如果你们几个都成了反革命，那么天下所有的人都是反革命！他们乱整，我们去告他们！

几个人都已经被吓坏了，把我当成了大救星。我倒不是有什么“独立见解”，只是坚决地“相信党”，相信我们学校的工作组做错了，“上级党组织”肯定会来纠正的。但是，这个“上级党组织”到底是谁呢？不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不能去找教育局，因为教育局就是工作组的顶头上司，相当于工作组的“爹”，当爹的肯定是要帮儿子说话的。得去找比教育局更“上级”的党组织。我突然想起人民南路的陕西街有个高教局。就这个“高”字，肯定比教育局的水平要高，离我们学校又近。第二天一大早，就带上他们四个人去了。

接待我们的是一个中年人，样子也是个处长之类的，态度很和蔼。我说得慷慨激昂，大道理一套一套的，说学校工作组和党中央的方针没有保持一致，转移斗争大方向，把矛头指向我们学生，目的是要保那些“牛鬼蛇神”过关。那干部认真做了记录，还让大家填了一张表格，把姓名、年龄、班级都写下来，说是要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我们得意啊，觉得自己成了大人物。谁写了错别字，大家还笑他。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像阿 Q 临死的时候画的那个圆，费了很大的力气还没有画好，觉得很遗憾。

林：完全没有想到实际上他们都是一伙的。

黄：岂止是一伙，厉害得多。我们还在回去的路上，高教局的那个干部就把电话打到学校去了，说我们几个去告了工作组的状，要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特别要注意那个名叫黄振海的学生，他背后肯定有人。结果是我们一进学校的大门，就被分别“请”到不同的教室，个别谈话，核心内容就是要交出“幕后黑手”，因为高教局的那个干部说，按照我们这几个中学生的水平，绝对说不出那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道理，肯定是背后有“黑手”在操纵。

林：（笑）他们不知道列宁说过的一句话吗：“革命时期群众在一天中学到的东西，比平时一年里学到的还要多。”何况你已经在外面看了好几天的大字报了。

黄：当时这句话满天飞，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啊。他们是不相信。不相信几个“街娃”学生的“马列主义水平”比他们还要高。在以后的几天里，全校停课，“全体革命师生”集中火力批判我们，大字报铺天盖地。我们几个当然不甘心就这样“束手就擒”，不停地在争辩。就在这个时候，工作大队的张队长到我们学校来了。

张队长是个北方人，长得高大魁梧，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中气很足，每次来的时候都坐一辆小轿车，一看就是个大官，革命老干部，让人不由得肃然起敬。我们一看他来了，就觉得有希望了，因为他是上级党组织，领导整个城南片区中学的运动，是有水平的，公正的，绝对不会冤枉我们的——党怎么会冤枉好人呢。

我们被叫到了工作组的大办公室，全体工作组的成员都在，那些“紧紧团结在党周围”的老师同学也涌进来，把一个大办公室挤得满满的，大约有四五十个人。工作组拿出了四个人蹭掉的那块大字报，“铁证如山”，告状同学拍着胸口出来“作证”……我们激烈争辩，表白我们的确不是“反党”，我们只是去向上级党组织反映工作组的错误做法，我们是坚决相信党的……

林：现在的关键人物是那个张队长，他怎么说？

黄：他坐在那里，只是听，就是不表态，越是让我们充满了希望，一个劲地在他面前表白自己，希望他能够为我们“申冤”。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黄昏，最后张队长做了总结性的发言，一句话就给我们定了性：撕了大字报，就是破坏文化大革命。还要去状告工作组，性质就更恶劣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你们去告工作组这件事，要从思想深处挖根子，找原因！

张队长的表态，无异于“法庭判决”，把我们几个完全震懵了，心想他是不是说错了，或者是我们听错了？可是他的确是这样说的，说得斩钉截铁，义无反顾。于是我们几个人开始反抗。我义正辞严，一口一个“你们完全是污蔑！”“你们和党中央背道而驰！”同学陈则破口大骂。张队长指着他说：你小子犯了这么大的错误，还有脸在这里胡闹？！同学陈气坏了，从桌子上抄起一个白瓷的茶壶朝着他喊道：日你的妈哟老子给你掙过来

！当时就有人“挺身而出”，一下子就站到了张队长的前面，那阵仗好像要用胸口替他挡子弹。

林：你们居然敢威胁工作组的大队长！

黄：张队长脸都气黄了，站起来说今天就到这里，明天继续开会！第二天，会场转移到我们的教室。头天的事情已经成了学校里的特大新闻，除了我们班上的同学，那些“积极分子”都来了，教室里挤不下，就挤在走廊里。张队长气昂昂走进来，站上讲台开始讲话。他情绪激动地说：同学们，昨天有人还想用水壶来打我！为了革命，打我可以忍受，但是，要杀我就不行！我就要自卫！当然了，打我也好杀我也罢，都算不了什么，但是，你们要反对毛主席，我就决不答应！！

他说到这里，声音发哽，泪花包在眼眶里。教室内外的人都被他的“激情”感动了，有人站起来带头高呼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

谁要杀他了？谁要反对毛主席了？昨天的事情跟毛主席有什么关系啊？可是现场已经完全没有我们辩解的余地了。就在这一瞬间，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完全不是什么“祖国的花朵”，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已经变成了电影《暴风骤雨》里被贫下中农斗争的地主分子“韩老六”，成了人民的敌人！

林：心里害怕吗？

黄：当然害怕了。我们再是调皮捣蛋，可也是带着红领巾长大的啊。记得就在几个月前，我们全班参加学校举办的歌咏比赛，大家在棉袄外面套上白衬衣，打着红领巾，化了妆，上台去唱《永远不能忘，阶级仇恨深如海》，还得了个第一名，高兴得欢呼雀跃。可是现在，我们突然就变成了“地主韩老六”，成了老师和同学举起拳头要“打倒”的对象，这个“弯”也转得太大了。

林：通常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出现两个极端。一个是精神上完全垮了，“认罪伏法”；另外是鱼死网破，拼死一搏。你们属于哪一种？

黄：我们也觉得自己“闯祸了”，很紧张，很沮丧，因为我们都从父母那里知道“犯错误”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就像那些“右派分子”，不但自己一辈

子翻不了身，而且还会连累父母亲人。有同学端起碗就哭，我心里也是沉甸甸的，饭都吃不下，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可是究竟错在哪里，始终想不明白。是不应该去告工作组？是不应该去和张队长顶嘴？可是难道就眼睁睁地让他们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就是杀只鸡也得“坂”（注：川语，挣扎之意）两下嘛。再说此时的工作组拼命想要“扩大战果”，几个初三的学生靶子太小了，费这么大的劲不划算，得揪个大点的。他们认定“黑手”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因为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学校工作组的组长私下来做我们的工作，她很“同情”地对同学陈说：“我知道你是受蒙蔽的，受蒙蔽无罪嘛。明天开大会的时候，只要你出来揭发班主任，就说撕大字报是他指使的，就保证不再追究你们几个。”这样的做法分明就是无中生有，陷害忠良，未免也有点太“下作”了嘛！

林：那你们怎么办？

黄：同学陈当时心里害怕，也答应了。可是第二天开会的时候，工作组长点名要他发言，揭发幕后的黑手，他却始终不吱声。最后实在是逼急了，他小子一转身，居然指着组长本人大声说：就是她！就是她给了我一角五分钱，让我去撕大字报的！

林：“鱼死网破”了。不过点子有点“歪”，是不是你的主意？

黄：不是。是他自己的主意。不过对于这种诬陷的愤恨，却是我们共同的。班主任是个很老好的人，那时候我们一下课就泡在锦江河里打水仗，打了上课铃都不起来，班主任跑到河边急得直跳脚，对我们伤透了脑筋，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样的老师会指使我们去反党反社会主义？借给他二十四胆子也不敢啊。栽赃陷害这样的好人，真是没良心。

林：他们做梦都不会想到你们这样已经被“划入另册”的初中生，几个没有任何后台的“街娃”，居然敢在大会上当面造工作组组长的谣。斗争肯定会升级。你们怎么应付这个局面？

黄：头天下来我们就商量了：既然他们已经定了性，把我们当成了阶级敌人，就根本就没有我们说话的余地，怎么说都是不老实，说不好还被他们抓住把柄。干脆就不说。咱们好汉不吃眼前亏。现在最重要的，是把那些斗争我们最积极的人，都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全部都要记下来，以后才好

报仇。包括那些“揭发”我们的同学，那样的“罪行”在他们身上也能够找到一大堆，我们什么时候翻身了，也要起来揭发他们，还有那些斗争我们的老师，一个都不放过，让他们也尝尝当反革命的味道！我们最恨的就是那个最先去告发的高中生，商量着怎么去把他打一顿。当时当然是不可能的。这个仇到一年之后才报了。

林：怎么报的？

黄：那时候我已经成了锦江中学八二六的头头，那家伙也参加进来，成了我的兵。一次约好一起去和另外一派的打架，到时候他倒是去了，可是我们几个都不去，结果他光杆一个，孤立无援，被人家着实捶了一顿，挨惨了。可把我们乐坏了。真是君子报仇三年不晚。

林：听起来有点孩子式的恶作剧。话说远了，还是说第二天的斗争会吧。

黄：在第二天的会上，我们的原则就是不开腔，任随他们口号连天，就是不开腔。实在是躲不过去，就承认，什么罪名都承认。同学陈之所以要出来反咬一口，是因为实在是逼急了，忍不住了耍了一“横”。说完了又不开腔了。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这样会场上就很没劲啊，可是也拿我们没办法。

林：就这样逃过了一劫？

黄：不可能啊，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站出来，指着我大声说：这个黄振海，昨天是何等的嚣张，今天怎么就像一只缩头的乌龟趴在那里，不吭声了呢？革命师生们，大家要擦亮眼睛，千万不要上他的当！他一定有更大的阴谋诡计！此言一出，宛如晴天霹雳。我抬头一看，大吃一惊：此人居然是我的数学老师。

林：既然那么多人都在揭发，为什么只对他大吃一惊？

黄：这个揭发的老师姓魏，人称“魏铁嘴”，学者风度，知识渊博，教数学教得特别好，讲起课来妙趣横生，我和很多学生都崇拜他。因为我的数学成绩好，他还表扬过我。我现在都还记得大家在食堂吃饭，和他一起说说笑笑的情景，那时候我们这些学生能够和魏老师在一起吃饭说笑，简直就是值得炫耀的“荣幸”。再说我觉得只有那些热衷于政治、或者平时被人看不起，现在急于“挣表现”的人，才会这么积极地起来揭发别人，因为搞

政治很容易啊，根本就用不着什么学问，就是揪反革命嘛，就像警察就是专门抓小偷的，屠夫就是专门杀猪的。可他一个专业课教得那么好的老师，怎么也搅和进来了？更要命的是因为他有智慧，目光就更加“犀利”，我确实在暗中策划“秋后算账”，这确实是“更大的阴谋诡计”。要是他进一步顺藤摸瓜，真的摸出了“更大的阴谋”是什么，我们就都别想活了。我们毕竟只是十几岁的孩子，政治上还没那么老练，差点就沉不住气，觉得这太可怕了。事实上此言一出，会场上情绪高涨，我们的境遇确实更糟了。

林：说起文革，很多人的印象都是学生对不起老师。因为那时候的学生太年轻，很容易受煽动打人。可是他一个老师，为什么对这些十几岁的、自己的学生如此下手？

黄：我也不明白，只是觉得他的“揭发”和别人不同。比如说工作组长，她在斗争会上的慷慨激昂，是理直气壮的，是真的认为自己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做斗争。可是这个姓魏的不同，当我抬头看他时，他马上避开了我的目光，这说明他是心虚的，他知道我们不是什么反革命，可是他却继续揭发批判，死追猛打。他到底是为什么要昧着良心说话？直到后来我当了学校八二六的头头，在学校后面的老城墙根逮住了他，他自己才说出了真话。

林：他说为什么？

黄：他说：是“他们”喊我这样做的。

林：这个“他们”是指的工作组吗？

黄：当然。他还承认他摇动“三寸不烂之舌”来陷害我们，是因为“有私心”。

林：那“私心”又是什么？

黄：往上爬呗。

林：你打他了吗？

黄：没有。我身上确实带着枪，一把美国柯尔特手枪，而且当时我已经带人打过了工作组的张队长，打得他胃出血；还打过了市委宣传部的白部长，给了他一耳光。一听姓魏的说他整我们是为了他自己的“私心”，我禁不住

就伸手去摸屁股后面的枪，可是我最终没有拔出来，我甚至都没有打他，还禁止了同伙们打他。他这样不惜践踏学生对自己的尊敬，不惜踩着学生的脊背去往上爬的人，太卑鄙了，仅仅用“打”的方式，未免太简单化，我得学着他当年斗争我们的口气，也来“挽救”他一回。于是就学着工作组训斥我们的样子，狠狠地训斥他，“教育”他，伤他的脸面和自尊心，看见他缩在老城墙的黄泥巴地上抖抖索索唯唯诺诺的样子，我心里升起一股莫名的快意，觉得比打他还要痛快。最后我高高在上地说了一句下台阶的话：我看你是个才子，今天饶了你！说完带着我的那些同伙，走了。

林：这样的“秋后算账”，是不是带有“精神胜利”的意味？

黄：杀人不过头点地，只要他认了就行。何况他还曾经是我非常钦佩的老师，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老师。当然了，他并非真正认错了。他后来成了市里部长级的干部，我想直到今天，他也是恨我的，一直在恨我逼他“认错”丢面子的这一幕。其实我是很希望他能够看到这篇文章的，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林：不说他了。说你怎么打工作大队的张队长吧。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工作组“犯错误”的？

黄：根本就没有“犯错误”这一说。就在斗争我们的热潮中，一天锦江中学的全体师生到临近的盐道街学校，听刘少奇、邓小平的讲话录音。人太多，乱哄哄的，根本听不清楚，反正和工作组啊文化大革命啊有关系。

林：我当时就是盐道街中学的学生。记得那是8月3号，中共成都市委在全市分片召开中学师生员工大会，各个会场都播放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在北京高等和中等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录音，之后宣布了成都市委的通知：立即撤销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并尽快撤销中学工作组。

黄：这才知道工作组要撤了，原因是上面说的“派工作组的办法，已经不能适应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要求”。就这句话。根本就没说“犯错误”。又过了几天，看到一张传单，那传单有半张报纸大，而且就是用新闻纸印的，以至于在我的印象中它就是一张报纸。上面的标题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我一看，特别是这几句：**五十多天里……颠倒**

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这简直就是专门为我们几个人写的，写得太好了！

林：真是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毛主席是咱的大救星。这也是当时的很多造反派“誓死紧跟毛主席”的重要原因。至于发现上当，那是后来的事情。

黄：就是。我兴奋得一晚上没睡觉，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到学校，砰砰砰踢着工作组的寝室门，大喊大叫。吓得组长在广播里喊：全校革命师生们，大家要注意生命安全！我们冲进去，把传单拍在桌子上：看！毛主席为我们撑腰了！工作组长拿起那张传单，看过去看过来，半天才说：这是传单，我们要等正式的文件。还是不认账。我气坏了，抓起传单放在他眼皮子底下：你敢怀疑毛主席？

这张大字报一出来，世界就完全乱了。我们不上课了，到处去闹革命。记得是在“步行串联”之后，就是快年底吧，学校老师成立了《红教工》造反组织，开大会斗争工作组，都认为把我们几个学生打成“反革命”这件事情做得太黑了，让我们回去“控诉”。我们几个在台上声色俱厉，声嘶力竭，按理说应该是一报还一报，报仇雪恨了。可是无论怎么斗，总是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觉得他们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是“正式”的，能够给我们一辈子“定性”。而我们来斗争他们，是“非正式”的，不作数的。他们的背后好像有一根擎天大柱撑着，是打不倒的。

林：于是就想再去打他一顿？

黄：还是没有起这个念头。因为在此之后，周恩来总理有个讲话，意思是说工作组也是执行上级的指示，责任不完全在他们。于是斗工作组的浪潮就渐渐平息了。大家觉得周总理的话，还是应该听的。如果那个张队长后来不在我面前抖威风，特别是如果我们不知道他们打算要把我们送去“劳动教养”的事，我想事情也就到此为止。可是这两件事情，都发生了。

林：详细说说。

黄：记得是“二月镇反”的时候，川大八二六和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的人，倒卷着旗帜去人民南路“向毛主席请罪”，跪倒一大片。我看了觉得很憋气，回到走马街口子上，突然有一部华沙牌小轿车在我面前刹住，从车上走

下来一个人，拦在我的面前，很神气地抖了抖肩膀上的军大衣，斜眼看着我哼了一声，然后又钻进小轿车，开走了。等我回过神来，才想起那个人就是张队长。后来“二月镇反”结束了，八二六和兵团的头头都从监狱里放出来，翻了身，成了中央肯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气焰越是有些嚣张。工作组已经撤了，我们就报复那些斗争过我们的老师，其中就有后来的“班主任”——她是个党员，完全按照工作组的意图，在班上可是把我们斗惨了。我们满心的仇恨，用叉头扫把打她，她一个劲地认错坦白，说出了一个小秘密：当初工作组向上面打了很正式的报告，而且上面也正式下了批文，要把我们五个人送去劳动教养。我们跑到档案室把档案翻出来，在几尺高的揭发材料里面，果然发现了很正式的红头文件，还有文号，一式五份，分别写着我们五个人的名字，由当时的市委宣传部部长白紫池亲笔签名，要把我们送去劳动教养。记得那签名还写得很潇洒——白紫池的字写得不错。

林：这下子“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了。

黄：你想想：就因为蹭掉了大字报的一只角，我们五个人就要去当劳教犯？劳教犯可是比“右派分子”还要恶劣啊——因为在老百姓的印象中，“右派分子”起码人不坏嘛，而且还都是些有学问的上等人，“劳教犯”就是些社会渣滓，下三滥。我们都还是十几岁的孩子，这样一来不但我们这辈子完了，连爷爷奶奶父母兄弟亲戚朋友都牵连其中，没脸见人了。我怒不可遏，带上兄弟伙直接去了张队长的单位，就在办公室把他暴打了一顿，打得他胃出血，临走的时候还扔下一句话：给老子写检讨！

我们一走，他就住进了医院，一个星期之后才把检讨交上来。那检讨写得很聪明，什么都承认了，又什么都没有承认。我们哪里肯罢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当初总是说我们不老实，现在我们还是说他不老实，追到他家里，命令他重新写。不但是他了，连他老婆都吓得发抖。

林：这件事情是不是对你的性格起了很大的影响？

黄：当然。在这之前，我从来都没有打过人，而在这之后，我心里满是仇恨，打了一些人。

林：那么后来呢？

黄：文革之后，我就再也不打人了。

林：这次要是再打，就要出事了。

黄：幸亏他那女儿。那女孩大约十来岁，看着我惊恐万分，吓坏了。我一看她那眼神，就手软了。于是就放了那姓张的一马，算了。

林：不管怎么说，打人不是件好事，周围的人怎么看？

黄：城南片区的老师们听说姓张的挨了打，奔走相告，因为工作组一进学校就在教师里面划出了大批“反革命”，我们总算是为老师们都出了一口气。特别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当初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几个平时不听话的“费头子娃娃”，能够在那么关键的时候守住做人的“底线”，挺身而出为自己的老师“挡子弹”。这在当时是许多“大人物”都办不到的。他到临死的时候都记得这件事情，对我们、特别是对同学陈充满了感激。

林：把张玉龙打了，后来也逼着“魏铁嘴”认错了。还有白紫池白部长呢？

黄：也打了。我们去市委，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找到他。他躲在市委隔壁的羊市巷的一间屋子里，手下还有几个人。我们一上去就捞拳扎袖，日妈捣娘地冲他直嚷嚷。他嘴上说着很文雅的官话，那表情有些莫名其妙。我一看更气了，觉得他干了这么大的坏事，差点断送了我们五个人的前途，还挺沉得住气的，这虾子！上去就给了他一耳光！

林：就打了一耳光？

黄：就打了一耳光。他和张队长不同的是：一是没有直接面对我们，斗争我们，激不起那么大的仇恨。再说此事毕竟没有成为现实。二是我们在心底还是有个说起来很“阿 Q”的潜意识：我们打的毕竟是一个大官儿啊。要不是文化大革命，要不是造反派翻了身，我们敢打他这样的大官吗？给他一耳光，心里已经得到满足了。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我们打姓张的已经把气出够了。打他的时候，心中的“气”已经是强弩之末。他当时有些莫名其妙的样子，显然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打他，现在想起来，他可能已经记不得他在这样的文件上签了名。他一天要签多少文件啊，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人家把材料送到他的手里，他就签，就像个签名的机器。

林：文革前，他是成都市委宣传部长，文革初期，他当了很长时间的成都市文革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尽管签发的文件多，或者是形势所逼，不得不签，

可是因为蹭破一张大字报就把五个初中生送去劳教的事情，应该是有记忆的。

黄：他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林：你最基本的心理，还是“有仇不报非君子”。

黄：就是。打了工作组的头头，还要报复那些“团结在党的周围”来批斗我们的“革命师生”。所有得罪过我们的人，揭发过我们的人，逼迫我们的人，特别是那些跳得高的，“左”得厉害的，几乎都遭到了报复，包括那个马老师。有些女的，不好动手，也得吓唬吓唬。不过很多人不是我们动手去报复的，根本就用不着。不久就闹“红五类”“黑五类”，我们班上五十四个同学，有三十七个成了“黑五类”。三十七个啊，还不包括我这样出生于小手工业者家庭的“麻五类”。当初揭发斗争过我们的那些同学，几乎全军覆没，都成了黑五类的“狗崽子”，尝到了人下人的滋味。这个时候，我又站出来，和那些“红五类”辩论，当时我反击的“名言”非常蛮横：那些说别人是狗崽子的人，自己就是狗崽子！！没有想到一语成谶，这话很快就兑现了：紧接着那些干部子弟的父母纷纷被批斗，他们果真成了“狗崽子”。

林：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现在也是六十岁的人，怎么看当初的这段历史？

黄：这个事件是我人生的一条分界线。在此之前，我和我的那些同学们，都是绝对听党的话，我们已经是党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已经是党的刀枪，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可是没有想到，我们最后还是被变成了党的敌人。工作组派出那些“积极争取进步”的同学，还有学校的党团员，到处去收集我们的“材料”。他们找到居委会的党组织，还有家长工作单位的党组织，然后再通过党组织去发动群众，让我觉得所有的“党组织”联起了一张网，网起了所有的“革命群众”，完全将我们置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但收集我们的材料，还要收集我们家长的材料，因为家长肯定也是“黑后台”之一。别说是那几个本身就“有问题”的家长了，就连我妈也有人乘机举报，说她“污蔑税务机关”。

于是，从张队长宣布我们是“反革命”的那个下午开始，经过十几年的教育建立起来的信仰，就完全崩溃了，从此再也不相信他们。从虔诚的“

信徒”，变成了“自由人”。

林：现在很多当年红卫兵都站出来，向被自己伤害过的人道歉，你呢？

黄：我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道歉了。大约 1973 年的 9 月吧，我插队回来读了个进修班，就去六中教书，发现当年锦江中学一个姓汪的“右派老师”也在六中。在我们的印象中，汪老师长得一表人才，穿一身干净的中山服，可是从来都没上过课，学校给他安排了一间小屋，既是寝室也是“办公室”，不知道他成天在干什么。文革一来，他就被揪出来，后来我们造反，自然也把他当成了“专政对象”，虽然我自己没有动手打他，可是心底还是把他看成“阶级敌人”的，同伙们对他“无情斗争”，我是没有阻止的。当时看到他，我的心里非常矛盾，想了一个晚上，决定去给他道歉。第二天我找到他，他很快想起我是谁，很高兴地给了我一拳：你这个黄振海！我说，汪老师，那些年我们不懂事，做了些很对不起你的事，请你原谅啊！汪老师急忙摆摆手，说不怪你们！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们！后来汪老师还给我介绍对象，可惜我已经结婚了。

我是一个好人，却在那样的年月里，也伤害过很多的好人，为此我真诚地向他们道歉。可是打了刚才说的这几个人，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中国的老百姓，已经活得很不容易，还动不动就要因为一点点小事情送监狱，劳改劳教，连十几岁的孩子都不放过。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连一丁点向我们道歉的意思都没有，反而依然在记恨着我们。你说到底应该谁向谁道歉？

【口述历史】

口述史与文革研究

邢小群

由于官方以行政权力设阻——文革档案不开放，文革出版物受限制，有关文革的学术研究在中国大陆几乎停顿。出于历史的使命感，民间的独立学者对于文革，仍然坚持抢救性的学术研究。采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就成为目前条件下推动文革研究继续深入的一条可行之路。本文仅对口述史与文革研究的几个

相关问题作一讨论。

一、抢救历史资料的迫切性

之所以采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开展文革研究，首先是出于时间的考虑。文革是一段特殊的历史。参与者的年龄，是从十几岁的学生，到七八十岁的老年人。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十几岁的中学生，现在已经五十多岁。当时四五十岁的中年人，现在已经八、九十岁。而当时六十岁以上的老人，现在基本上都去世了。口述历史的对象，是历史的当事人。采访文革的重要当事人，从时间上讲，已经十分紧迫。如果现在抓紧进行，还可能采访到一些当时的中年人。如果再拖二十年，只能采访当时的年轻人了。

就我自己的体会而言，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采访过的吴祖光、温济泽、萧乾、李慎之、唐达成、郑惠等人，文革时都是中年人，采访时年龄在七十岁到八十多岁，最近几年他们都已陆续去世了。有的采访对象正在约定当中，就突然去世，比如项南。所以，今天做口述史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和死神赛跑。

口述史的难度有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当事人有心理压力，不愿意接受采访；二是他们不接受口述史的方式，要自己写回忆录。

李慎之，唐达成，郑惠等人开始都不愿意做口述史，一方面觉得自己就能写，还有时间；一方面总觉得别人的记录不如自己写出来的准确、完备。我有一个朋友赵诚约黄万里做口述史，黄说要自己写，还没动笔，就去世了。

文革中的重要当事人，比如陈伯达，他的儿子陈晓农和他做了口述回忆，出了书，就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线索和资料。而王、张、江、姚已经全部去世，想做口述史也不可能了。

现在，口述历史一方面可以着重抢救老年的当事人，一方面也要重视中年的当事人，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或者重大事件的参与者、目击者、知情者、政治运动的受害者，都值得重视。

二、现象比文献更丰富

任何历史，现象层面都比文献更丰富，文革也是如此。口述历史，对现象层面的挖掘，具有特殊的优势。

比如，我采访郑惠先生，请他谈谈他所了解的胡乔木。谈到文革后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的胡乔木，郑惠说邓小平 1975 年 6 月出来主持工作时，让胡乔木出面组织成立了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其中一个组负责编选整理毛泽东著作，当时这个组经常和小平一起读些毛泽东的文章，小平也常讲些话，并把从毛泽东那里听到些什么情况和意见传达给这些人。每次谈话吴冷西都一一记下来了。到 1975 年 10 月批邓时，研究室不得不批邓，也批胡乔木，别人其实是明批暗保。但吴冷西是一条一条揭发：几月几日邓小平讲的是什么。本来，乔木可能还想一般性地揭揭，应付过去。吴冷西这么一来，他绷不住了，因为邓小平讲话，乔木都在场。后来，乔木也一条一条地揭发起来。他还写了一个详细揭发邓小平的材料，除了一些事实以外，还有他自己对邓小平的一些评价。郑惠记得有这样的话：“这个人（邓小平）顽固又虚伪。”这时，胡乔木精神就完全垮了。郑惠说：“记得有一次，他挨批斗完了，连走路都走不动了。我扶着他回办公室，我怕他心情太坏。我一直在想，他在党内生活这么多年，他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看来个人的得失，还是他的根本考虑。毛主席是他依靠的支柱，这时毛主席对他不信任了，他觉得身败名裂，看不到前途了，认为他可能翻不过身来了。”（邢小群《我所了解的胡乔木——郑惠访谈》，《往事回声》，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5 年 5 月出版。30—31 页）这样的细节，也是文献里不会记载的。但对于胡乔木性格的把握，又极为重要。个人的感受，是很主观的东西。但在史学研究中，如果排斥这样的细节，历史可能就失去了血肉。这正是口述历史的长处之一。

三、个案研究比群体概括更接近历史真实

在中国大陆的舆论中，关于红卫兵、造反派，已经成为一种宽泛的符号，

往往与批斗走资派、打砸抢、破四旧、武斗等负面行为相联系，从群体上已经妖魔化。其实，每一个参加过红卫兵、造反派或其他群众组织的人，都是具体的，都有具体的心理动机和行为逻辑。口述历史，有助于恢复每个具体个人的真实情况，而不是把个人消化在模糊的群体之中。

例一：

我对《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前任主编李大同的文革经历做过采访。他是一个干部子弟。他的经历就不同于一般的老红卫兵。

李大同的父亲是 1938 到延安，整风中“抢救”过的干部，曾经是胡耀邦在川北工作时的助手，是胡在团中央时的宣传部部长。文革初的一天晚上，李大同给他父亲提了十个问题，写在一张纸上，放在他桌上。对当时种种过火行为表示不能理解。这十个问题，立刻让团中央如获至宝。到处都在造反，竟然有这样的一些保守看法！很快刊登在 1966 年下半年的《团的情况》（团中央的内参）上。引语说：一个 14 岁的学生李大同向其父亲提出十个问题……

李大同是 1967 届初中生。1966 年 7 月参加红卫兵。他属于老红卫兵，但他又很保守。他反对血统论，反感对老师的暴力行为，没有参加打砸抢一类事。没有参加以高干子弟为主的联动。半年后，老红卫兵失势，李大同的父亲让红卫兵把腿打断了。多数老红卫兵已经没有血统论支持下的士气。红卫兵出现分化，李大同属于第一拨被分化出去的干部子弟。1968 年以后，中学红卫兵从整体上看已经边缘化、逍遥化。一部分人无事可做，在街上打架斗殴，“拍婆子”。李大同选择的是强身和读书。他们跟着学校的军代表学习擒拿、格斗，和其他干部子弟交换读书。他说，要说我们干部子弟有什么特权，那就是信息特权。我想他的信息特权，还不完全是上层消息一类，更多的是他们家能拿到当时社会上公开与内部发行的所有的书。读书就会造成头脑的一定的“混乱”。因为传统宣传教育的力量仍很强大。正如李大同说：“因为我们同时还在接受伪历史、伪知识，它们也在消蚀着我们的想法。”但一定的阅读特权生成了这一批人的怀疑精神。今天反思的彻底性，与这种阅读有关系。对于李大同来说，他既是红卫兵，又是思考者。他当年的思想逻辑和今天的追求，是一脉相承的。

例二：

何方曾经长时间担任张闻天的助手。1959 年被外交部定为张闻天反党宗派重要成员。他是老干部，但文革中支持过外交部造反派，对抓“五一六”持否定态度。

他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外交部领导就指定了三十五个批判重点。这些人大多是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挨过整、或有什么历史问题的人。他的体会是：每次运动一来，从上到下的各单位领导常用的手段是，赶快找几个或者一批重点，先抛出去，一方面表示积极推动了运动，一方面又保护了自己。他说——

“‘文革’初，以干部子弟和一些工人家庭出身的普通干部组成的红卫兵如毛泽东的亲戚王海容、李一氓的儿子李世滨等一批人，带着红箍，开到了我家。把我所有的书，往几个大木箱里装，加上封条。还把我的笔记本都收走了，大概是从里面找我和其他人的罪证吧。”他说：“‘文化大革命’这个期间，我的倾向性很明显：第一，我支持‘文化大革命’；第二，我支持打倒‘陈、姬、乔’（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的口号。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思想呢？因为我对革命队伍里的一些现象不满意，我真的以为毛主席要扫荡特权和官僚主义。例如，姬鹏飞、乔冠华凭什么一年到头抽“三五”烟？“三五”烟国内根本就没卖的，都是从国外搞来的，是大使们拿公款给部长们送的礼，我对这类现象极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确有错误。而且那时打倒是比较普遍和随便的现象，并不意味着真的打倒，主要含义还是批斗和拉下马的意思。后来外交部造反派上来了，以干部子弟为代表的红卫兵成了保守派。造反派闹腾了一两年，曾得到文革小组支持，他们反对当权派，打击面太宽，犯了不少错误。但运动还比较文明，也一直没有夺外交权。随着支持外交部造反派的王力垮台，造反派在批极左抓坏人的运动中被彻底整垮，一些头目被抓了起来，很多人后来又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得到

周恩来支持的、同陈、姬、乔和各级原领导结合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起来，成了外交部‘文化革命’的主流派，一直再没倒。外交部整‘五一六’分子，是周恩来亲自抓的。因‘五一六’罪名被整人数有 2000 人，有些司几乎二分之一（个别司甚至更多）的人被打成‘五一六’。把一些很有水平的人打成‘五一六分子’，同时又是找垫背的，把‘文革’的罪过推到这些人的身上。邓小平、陈云在这些问题上有派性，处理得不好。至今没有给为时两年多、上千万人被整被抓的‘五一六’运动这一冤案平反，官史根本不提这件事。”（笔者与何方 2006 年 2 月 25 日交谈，由何方核定）

何方口述中认为周恩来在外交部打“五一六”，有报复之嫌。外交部的“五一六”分子被逼死逼疯打伤不计其数。造反派就这样全被打下去了。这一点，从马继森的《外交部文革纪实》一书中也可以证实。

何方在外交部只是一个旁观者，他早早被专政，连当造反派的资格都没有。但他的口述，有助于我们对具体单位的造反派有更真切的理解。宋永毅提出对“造反派”和“三种人”亟待澄清历史真相，确有必要。

四、口述历史是不是信史？

口述历史，是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近年来，史学界对口述历史的价值，日益关注，但也有分歧。口述者的记忆偏差和有意回避，使口述史的真实性程度受到怀疑。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口述历史是不是信史？

刘小萌认为：“口述中包含各种不真实成份，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时间久远，受访者记忆出现偏差，如记错了时间，人物张冠李戴、事件因果关系错乱等。而受访者站在今天的立场回溯历史，犹如戴着一副变色眼镜去眺望远处的山景。”（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13 页）

然而，刘小萌本人就是口述历史的实践者，著有《中国知青口述史》。尽管

他对口述史的真实性程度有保留，但他对口述史的价值是肯定的。

口述史是不是可信，既取决于口述者对历史的态度，也取决于采访者对历史的态度。如果双方都有一种求真务实的治史精神，口述历史完全可以成为信史。如果口述者有误记和避讳，采访者通过追问和考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口述者的缺陷。如果双方都没有求真务实精神，那就另当别论了。同样，依靠文献治史，如果无意求真，也不会写成信史。

还可以将口述历史和回忆录做一比较。

对这个问题，我与深谙中共党史学界内情的何方先生（《**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的作者）有一番探讨。何方对我说，他看过迄今为止不少高官要人的回忆录，对得起历史的资料不多。他们不但对自己不光彩的一面有所避讳；而且往往没有超越个人恩怨的眼光和胸怀。

在中国大陆，一方面，民间学者独立修史很困难，历史当事人以独立的立场写作出版回忆录很困难；另一方面，官方在不断地推出官修史书和官方审定的回忆录。特别是已经退出领导岗位的前党政军要员，这些年纷纷出版回忆录。他们有专人专款，组织写作班子，比如彭真的回忆录、传记写作班子就多达40多人。他们按中央定好的调子写，有时调子变了，回忆录的说法也得变。这些回忆录，出版时虽然个人署名，但和官修史书并无二致。某些回忆录甚至是有组织的欺骗，是有意识地造假。有些人的子女，为利益驱动，也直接干涉写作班子：这些事可写，那些事不能写。不但可以按需要取舍，甚至可以伪造史实。由此说来，文献记载下来的历史也不一定可靠，因为历史总是胜利者写下来的。

从历史的经验看，正史未必是信史，野史未必不是信史。在当今大陆语境下，官方组织撰写的高干回忆录，不论是否归入正史，其价值往往低于口述史。金冲及说，“我觉得口述历史往往讲得比较自由，假如让他写回忆录，有些情况可能不会写进去，比较谨慎。口述时，讲话脱口而出，把真的情况包括他自己的感受、周围的气氛都说出来了。”（《**专家学者谈口述历史**》，《**文汇报**》2005年10月7日14版）因而，口述史与回忆录相比，口述史更有接近真实的可能。

有些人本身不是重要人物，但他们的口述中有重要的见闻，同样有重要价值。如果历史的某些环节被遗忘了，被遮蔽了，而普通人的回忆恰恰能弥补这个环节，就可能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总之，无论是历史重要人物，还是与重要事件有关的普通人物，他们共同回顾，才可能复原历史的立体风貌。

口述史不仅具有史料意义，也可以成为史学研究本身。当事人除了回忆自己的经历，也可以提出问题，发表看法。可以追溯历史事件的原因，提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史学的要素，不论是史述，还是史论，在口述历史中都可以体现。

唐德刚在谈自己的口述历史工作时，讲到胡适、顾维钧和李宗仁的不同情况。胡适本身经过学术训练，对于言出无据的事十分慎重。顾维钧自己每天都有日记，他们的口述本身比较严谨。但李宗仁没有经过学术训练，讲话有信口开河的成份。唐德刚就要靠自己掌握的历史资料加以校正。这几种不同的对象，都有采访的价值。与胡适那样的口述者合作，固然容易达到信史的要求。与李宗仁这样口述者合作，经过认真努力的考证，也可以成为信史。退一步讲，有些往事的真相一时难以鉴别，或有歧义，先以忠实于口述者原意的方式记录下来，供别人比较鉴别，不论证伪也好，证实也好，总是推动史学研究的契机。

关于这个问题，曾经读到余汝信的文章《口述史的局限：以吴德〈十年风雨纪事〉为例》。他对此书的价值质疑颇见功力。但是，文革研究界仍然十分重视此书的价值。因为吴德是文革十年始终处在高层领导圈内的历史当事人，书中披露的某些正史回避的重要细节具有填补史学空白的意义。余汝信认为：“口述史的整理，目前存在着两种意见、两种办法。其一是口述者怎么说，整理者就怎么记，对原始素材不作任何加工改动，以期保留口述的‘原汁原味’；其二，是整理者对照文献档案，对口述的失真失实处、记忆的偏处‘或征求口述者意见后作出改动，或由整理者自行做出适当的校正性注释。笔者赞同后一种办法，因前一种办法得到的往往并非是信史，而吴德《十年风雨纪事》所用的恰恰却是前一种办法。以本书的整理者所处的位置，其实有相当优越的条件可以将口述素材与历史档案相互印证，即使如吴德自己坦言‘我的记忆不行’，整理者也可用注释加以补救，使其口述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阶段的真实，可惜，

整理者没有这样做。而以前一种办法所得到的口述纪录，对科学的历史研究所能起到的作用毕竟是非常有限的。”（引自：www.linbiao.org 网站上“余汝信文集”）据我所知，吴德的口述史并不是单纯的记录，采访者查阅过大量文献，当时吴德还有自己的笔记本放在保险柜里随时查阅。即使如此，仍不免留下诸多硬伤。余先生希望口述史整理者用第二种方法，达到信史，这追求是必要的。但在目前中国大陆的语境下，前一种方法整理的口述史，作为史料的线索进入公共视野，供学界进一步探讨，对文革研究的促进也不是坏事。

【蓦然回首】

当年通海闹地震

周孜仁

按：本文作者曾任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甫仁的秘书，亲历亲见了谭甫仁主政云南时期（包括谭甫仁遇刺在内）的许多重大事件。在那些荒诞年月里，这些事件都带有强烈的悲剧、闹剧兼笑剧的色彩。本篇节选自作者正在撰写的长篇回忆录《共产党省委秘书忏悔录》，是他的《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曾在网上连载，2006年由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版）的姊妹篇。

“谭甫仁办公室”设在昆明军区大院最深处的八号，与专门接待高级将领的“军区九号”毗邻。小院四周爬满长青藤的墙垣把我们和整个世界隔绝了。头儿甫汉——谭从北京带来的贴身秘书——肯定是全知全能的，但他什么也不会告诉我们。他只喜欢让我们埋头学习中央文件和《人民日报》社论，在虚构的大好形势的梦呓中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

但是，70年代开年伊始的中国凶信终以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形式直接传进了军区八号：就在学习了《人民日报》气壮山河的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后第四天，1月5日凌晨1时0分37秒，和我同住一屋的张德鸿、卜降奇和李

文辉突然从熟睡中骇然惊醒，三人拼命摇我的床挡，大叫快起来快起来！注意注意！为什么屋子摇动呀？他们谁也不知道该往外逃跑，只管傻傻地披衣立着，妄作空论：是否苏联打来了？在哪儿扔原子弹了？我睡意正浓，依旧懒洋洋地躺在床上，劝慰他们睡吧睡吧，等天亮再说——四人果然又酣然入睡。

我之所以那么沉得住气，除了年轻嗜睡，还有，就在来到八号之前曾经被相似的事件忽悠过。那一回，我正和保山的秀才们一起住在省委大院为积代会（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写典型材料，某日深夜，也是沉卧酣睡，突然有人敲门——我正好住靠门第一张床——我一眼认出了敲门人是省新闻组的：他也那么大叫：快起床快起床！他要全体集合马上外出拉练。熊学忠——就是后来当了云南省委党校副校长那位哥儿们——和我邻床，我一推他，他马上像上紧弹簧的机器人，一蹦便坐起来，环顾四周，极端认真地问了一句：

“苏修扔原子弹了吗？”

什么也没发生。只是按照布置，由新闻组那位干部领着这帮人生地不熟的专县土鳖，在黑灯瞎火中不知绕着哪儿瞎跑了一个多小时，再让大家回来睡觉……

那年头，毛泽东老是向百姓叫喊要打仗要打仗，要大家“备战备荒”，挖防空洞。“狼来了”叫得太多，大家反而麻木了。这一次，我们四人坚持睡到天亮才起床，这时已传来消息，说玉溪专区的通海、建水一带发生地震了。具体情况甫汉肯定是第一时间就已得知，而他恰恰从我们办公室蒸发了——我们好几天都没有再见到他。关于这次地震的更为确凿的信息，是地震发生 4 天后，《云南日报》刊出的一则显然经过严格审查的、轻描淡写、语焉不详的消息：

新华社昆明 8 日电：1970 年 1 月 5 日凌晨 1 时，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 7 级地震。

这次被地球物理专业领域定义为“通海地震”的大地震，事实上是中国灾难史上死亡人数和危害程度仅次于唐山大地震、与 2008 年发生在四川汶川的大地震等量的三大地震之一。后来证实的情况是：通海地震震级为里氏 7.7 级。受灾面积 8800 平方公里。地震造成 15621 人死亡。震中通海全县死亡 4426 人，占当时总人口的 2.64%。许多自然村夷为平地，有的村子只剩下两三名妇孺，幸存者在极度惊恐和精神创痛中苟延残喘。与通海毗邻的峨山县城逢 5 赶集

。4日下午，从四面八方汇集来、准备第二天赶集的人，将两层楼的大旅社挤得爆满，过道上还加了地铺。地震将这幢填满了山民的楼房夷为平地，当即砸死200余人！昆明工学院教职工140余人，正呆在设于峨山县小街镇的所谓“五七干校”接受政治洗礼。干校宿舍是一幢空置的仓库，当仓库厚重的墙体和巨大的屋架被地狱之神蓦然推倒，90多名大学教师整整齐齐地被砸死在床上，无一幸免。住其他地方的40多名老师也全部罹难。建水县曲溪中学168间校舍全部震毁。1月4日正是周日，留在学校的师生147人，是夜54人被压死，31人重伤、58人轻伤。校内只存一古庙屋架，像一具枯骨无望地向漆黑的上苍呐喊。

接下来得到的信息更加让人莫名其妙：中央为这次救灾提出了十六字方针：“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灾区“人民”立即加码：“对于地震，我们就是不怕。一千个不怕！一万个不怕！”他们主动提出“三不要”的响亮口号：“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对于支援，他们的态度是：“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当地政府明确宣布：除了“红宝书”和慰问信，其他一律不收！

满目废墟。死尸遍野。整村整村的人压在残垣断壁、土块瓦砾下哭泣着等待救援，可是一卡车接一卡车运来的，竟然是《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慰问信和毛泽东的像章！

1月10日，《云南日报》的报道有如下叙述：“……广大贫下中农说，地震震不掉我们贫下中农忠于毛主席的红心。”“震发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

当时正好在云南人民广播电台作记者的杨凯，这样叙述了他的灾区经历：地震当天下午7点（第一次强震发生已过去19个小时！），电台领导突然通知他马上出发。如今最多两小时的车程那次整整走了一夜。卡车直接把他们送到了震中地区的建水县曲江镇，安顿在部队营区一个钢结构的大棚里。领导安排他们的任务是，重点了解灾民如何在废墟中寻找毛主席的著作一类动人事迹。几十年后，他所记起的地震印象有两件事：一是到达目的地，眼目所见，完全一片废墟，一个老太太在废墟上向天长哭，十分凄惨；二是同行的新华社记者

王某，睡眠时有磨牙习惯，在死寂废墟之夜他的磨牙声尤其响亮，把大家全惊醒了。第二天一早哨兵就专门来问，说晚上听见大棚里有锯片的扎扎声，是否发现有阶级敌人锯大棚的钢柱？

何等的愚昧、无知和荒唐呀！

甫汉不在了，据说跟谭政委去灾区了——反正我们不知道也不想关心，和市民一样，我们开始关心自己的安全和生命。不管政府怎么封锁消息，整个昆明已经乱成一团糟。满街都是塑料薄膜搭建的窝棚：或在开阔地搭建“三棱锥”。或在行道树边，依树而搭，只用一根竹棍或木棒就够了；树丛中就更简单，随便张一块布或者油毛毡就解决问题。为“敬建毛主席万岁纪念馆”而被谭甫仁将军下令炸毁而又“敬建”未遂的文化宫旧址最为壮观：那儿宽敞，而且本来就是一片废墟，再加上如今五花八门的抗震棚，完全可以推荐给拍摄战争灾难片的导演免费使用。伟人和政府当局总是危言耸听地训诫中国百姓：个人的世俗生活多微不足道，只有解救全世界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你的生活才具有意义，可是当个人生命真正受到威胁的时候，中国人同样会为保护自己而使出浑身解数，表现出超人的智慧。

和外面破破烂烂的塑料棚、油布棚相比，军区八号和九号前面的地坝肯定是最美妙的地段了。让士兵们统一架起一排排钢筋支架，再担上一行行粗大的龙竹杆，然后将巨大的军用卡车帆布蒙盖上面，在蒙布下构成一巨大的、漫无边际的黑暗空间。每到黄昏，所有家属和军人都卷着席子和被褥往里面钻，寻找舒适空间过夜——虽然实际上怎么也不会舒服。可是和大院外的老百姓相比，实在很不错了。

我们八号情况就更好。张德鸿把木床从房间里搬到葡萄架下，还用绳子挂起来，再蒙上塑料薄膜御寒。我怎么也想不起他为什么一定要挂？其实放地上不是挺好吗？我开玩笑说他成阿拉伯的公主了。我占领的绝对属于有利位置：八号后墙边停了一辆废弃的中吉普。轮胎早已报废。铁轮箍直接着地。车壳很厚，即使墙倒下来也不至于砸扁。车内正好睡一个人，我可以高枕无忧。我甚至还不知从哪儿找来蜡烛，嵌在车窗边，点燃，悠哉游哉地夜读闲书：这一段乱世绿洲的日子真让人终身难忘。我相信当时我富有同情心，看到面前的黑暗空间，满城的塑料薄膜，我总会想，这么冷的冬天，他们怎么过呀！非常奇怪

，我记忆中的1970年1月很冷，压根儿和“春城”的美誉不搭界。每当晨起，看见花园里满地白霜，我总会想起满街抗震棚下冷得哆嗦的可怜百姓。

我还想不到灾区，那儿的情况我毫无概念。

后来甫汉就回来了。他整日价闷闷不乐，关于灾区的事，他滴水不漏，偶尔还发发牢骚。只是告诉我们，要在全省范围对地震开展“群测群防”，要注意有没有鸡不进厩？狗乱咬乱叫，甚至咬主人？井水突然往上冒？八号是没狗没鸡没水井的，无法观察这些异象，甫秘书就对我说：“你是学工的，做一个地震仪吧！”

我大学确实学工，而且成绩不错，这就遵命去买来电铃、干电池，又以谭办名义，请军区附近的冶金机械厂师傅为我们无偿加工了一只小铜球、一个小铜圆柱和八块小铜片。我把铜片和铜柱固定在木板上，分别接上电池的正极和负极。圆柱居中，铜球置于铜柱顶上，铜片则代表八个方向——简单说，就是模仿两千多年前张衡的候风地动仪，只是没有威风凛凛的龙和张开大嘴的蛤蟆装饰。一旦发生震动，铜球滚下来掉在相应方向的铜片上，接通了铜柱和相应铜片的电极，于是电铃大响，众人就抓紧逃命。除了干电池和电铃算得现代化器件，这个装置比两千多年前张衡的发明要土了许多。

八号这小别墅的抗震结构应当是信得过的，地震仪放在会议桌中间，大家更可安心了。有事没事，大家依旧坐在大厅一起继续读社论，话说天下大事，沉浸在七十年代宏伟的梦想中。某日我搞了一个恶作剧，正开会间，趁大家不注意，我悄悄潜到门外，故意把玻璃摇得哗啦哗啦响，虽然土仪器铜柱上的圆球没有滚下，大家还是被吓得一个劲儿往外跑。我开心极了。

慢慢地，我们便知道了些灾区实情。甫说，他确实跟着将军去了建水、通海、峨山等重灾区，看见死人太多，将军便下令要所有人都就地掩埋。其办法是：用推土机推出宽两米左右的深沟，像加工沙丁鱼罐头一样，把尸体一个紧挨一个码放整齐，推埋上几十公分的土，上面又码第二排，然后再推土，再第三层，直到高度与地面齐。我们在前面不是说到昆明工学院有138名教职员在地震中死亡吗？远在昆明的老师得知消息，连夜去昆明钢铁厂借了两部卡车，狂奔现场将尸体全部运回来，摆放在学院广场暴尸，等待家属从全国各地赶来认领。那年头讲革命化生活方式，死者多为分居的单身汉；那年头通讯和交通之落后也没法说，等认尸的家属赶来，有的早过了十天半月——好在天气奇冷，尸体还没腐烂。

这事公然违抗了“必须就地掩埋”的命令，惹得谭将军雷霆大怒。更何况这些死人全是知识分子！虽然该大学是八派（注：指云南造反派群众组织中的“八二三”组织，是受到谭甫仁当局力挺的一派）老窝，深得将军倚重，可是，“你们就该搞特殊化吗？难道知识分子就比当地的贫

下中农高贵吗？”他严令申斥，要该校领导必须深刻检讨，一次不行，写二次；二次不行，三次……

说到这事，甫秘书对谭将军做法颇多微辞。我们是从他的牢骚里才听出些真相的：很奇怪，正因为此，我公然对甫又有了好感。

地震时期，云南人还有一句振奋人心的口号：“地震失去的，我们要加倍让地球偿还！”仅仅听听喊口号这劲儿，你就足以感觉到云南人类对地球有多仇恨。事实上，被文革搞得精神错乱的昆明人，在此前已经开始荒唐地发泄这种仇恨了——事情具体是从1969年12月28日开始的。内容是向滇池发动的“夺取良田万顷的人民战争”，简单的定义就是：“围海造田”。《云南日报》的记者们在东风广场10万军民参加的“誓师大会”现场发出了如下报道：

红日刚刚从东方升起，来自晋宁、呈贡、富民、西山、官渡、五华、盘龙各县区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高举红旗，手捧红宝书，敲锣打鼓，迎着朝阳，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地进入会场……

“省、市革委会负责人”宣布，此举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教导，改天换地，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掀起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备战、备荒，培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第二天开始，昆明地区的工人、农民、军人、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在四个月、即1970年整整三分之一的漫长时间里，一律停产、半停产、停课、半停课地参加了这一愚蠢“壮举”。具体工程内容是：在滇池草海部分横建一条六公里长的大坝，然后抽干坝内湖水；同时，从滇池西岸的山上炸石取土，用船运来东岸，在排干的大坝之内填进约一米厚度泥土，从而造出约三万亩农田……

通海地震，为正在编写积代会典型材料的秀才们增加了“新题材”，推出了“新典型”，收获了“新成果”。比如，震中：通海-建水二县结合部涌现出

来的女典型 J 某，家乡突发大地震时从外地急急赶回，首先不救人，而是心急火燎去废墟中把收音机扒将出来——据她的“讲用报告”说，她是想马上听北京的声音，让毛主席指挥战斗——仅此一端，年方十八的 J 不仅当了积代会省代表，而且青云直上，很快当了省委常委。笔者有幸在积代会的昆明医学院分会场亲耳聆教了 J 某生猛难当的一副伶牙俐齿，时间是那年的十一月。J 的演讲是那么的兴高采烈，好像万人抛尸的通海大地震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

顺便说一句，就在 J 某迅速窜红不久，趁批林批孔之风，省委一号大院便有大字报贴出，题目是：《省委三千金》（对云南省三位政坛女士的窜红提出质疑）。大字报披露，说“三千金”之一的 J 某当年地震中那“动人事迹”实际上是“见物不见人，救物不救人”，皆因财迷心窍：那时全民生活水平低下，收音机很值钱的！

【书评与序跋】

从一个“样板团”看一段大历史 ——推荐周光萁著《中央乐团史》

何 蜀

在文化大革命中，“样板团”是一个十分响亮的名字，因为它们是新文“旗手”江青亲自抓的“点”，是江青进行文艺革命的“试验田”，在各地众多文艺团体都因执行了十七年“文艺黑线”而遭到批判、清算甚至下放、撤销、解散等打击的时候，只有“样板团”得天独厚，被列入军队编制，人员都穿上了当时最时髦的军装，吃的是营养得到保证的“样板伙食”，到各地演出都被当地“红色政权”待若上宾……总之，在当时普通人的心目中，“样板团”是新文风暴中令人羡慕的“绿洲”或“世外桃源”，一个美好、高贵而又神秘的地方。人们都想知道，在全国大动乱的形势下，样板团是否也跟其他单位一样有过造反、夺权和两派争斗？在“全面专政”的日子里，样板团是否也有过“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的恐怖血腥？“样板戏”的创作和演出是如何在文革的一片“打倒”、“砸烂”声中进行的？创作和演出

人员有过怎样的“样板”人生？……

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周光蓁这部力作中找到答案。本书共分四部：一、从孕育、创建到成长（1956—1966），二、“文革”样板团年代（1966—1976），三、改革开放时期（1977—1987），四、凤凰涅槃（1988—1996）。虽然不是只写中央乐团这个“样板团”的文革历史，但它最吸引笔者的正是占全书近四分之一篇幅的第二部中的内容。

中央乐团，比起京剧团、舞剧团等单位来说，要算是更加“阳春白雪”的高雅艺术团体，因此，它离普通民众的视线更远，更难为人所知，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它的名字却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因为在文革“样板戏”中，它就独占了三个：交响音乐《沙家浜》、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

按本书作者的说法，中央乐团“身处京畿政治暴风眼”，“面对连绵不绝的政治及意识形态论争，以及国家大上大落的政治、外交动态，既是对外的橱窗，又是对内的箭靶……乐团所经历的四十年也是共和国史的一个侧面”（自序）。乐团“直接卷入文革十年中共高层惨烈的政治斗争。虽然贵为全国唯一的样板乐团，乐师们的荣与辱却只是一线之差，往往改变于弹指之间，甚至付出血的代价和教训。”（207页）

读了此书，读者可以了解到，中央乐团这个“样板团”，不仅拥有三个“样板戏”，而且跟其他“样板团”相比，在许多方面还有自己独具的特色。

比如，在中央乐团里也跟社会上其他单位一样，群众组织派系林立，有保守派的“红旗战斗队”，有中间派的“延安战斗队”，也有大大小小的造反派：小提琴手陈力（父亲系高干）为首的“乐团红卫兵”，巴松管演奏员刘天语为首的“遵义战斗队”，大提琴手陆公达、邓宗安与冯琬珍夫妇等的“井冈山战斗队”，及随后联合各造反派组织扩大成立的“井冈山革命造反团”，还有后来因意见分歧而从“井冈山”中分化出来被斥为“托派”的“东方红公社”，甚至还有中提琴手唐仲歧独自一人成立的“一棵松战斗队”……“井冈山”与“东方红”对立两派还在宿舍区设立了各自的广播站，“井冈山”的播音员是学员班弹竖琴的王玫，“东方红”的播音员是弹钢琴的吴文俊（“东方红”头头之一、小提琴手盛明亮的夫人）。

比如，中央乐团的造反派虽然起来得较晚，但却十分活跃，影响很大，他们参加了三大艺术院校（电影、戏剧、音乐）红卫兵突破解放军警卫揪走彭真等“大黑帮”的“五分钟结束战斗”行动——彭真等人抓来后就被关在和平里中央乐团的排练厅；他们参加了文化部的1967年“一·一九”夺权——大提琴手陆公达还在夺权后留驻文化部担任“临委”领导成员；还有人到社会上参加活动，如打击乐声部的曹云汉在首都三司文艺部任“副司令”，巴松管演奏员门春富参加了全国文艺界造反组织“全艺造”的组建并在其中负责……

比如，在这个小小单位的成员中，就出了好几个进入高层权力机构的代表：大提琴手陈汝棠（“井冈山”头头）作为中央乐团代表担任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委员，24岁的大提琴手、乐团“井冈山”头头陆公达1967年夏成为中央文革文艺组成员（分管音乐舞蹈口），乐团指挥李德伦在70年代担任了国务院文化组审听小组成员和后来由文化部长于会泳领导的文化创作领导小组音乐业务代表，钢琴家殷承宗（乐团“东方红”成员）1975年初成为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因得到毛泽东的关照而从狱中释出后安排到中央乐团的钢琴家刘诗昆文革后成为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

又比如，中央乐团在“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遭到的重创也令人惊骇，小小一个乐团即有四人不堪诬陷迫害和酷刑逼供而自杀：曾任中央文革文艺组成员的陆公达跳楼自杀，原中央乐团党委成员、乐队队长陈子信触电加喝杀虫药自杀，曾任全国文艺界造反组织负责人的巴松管演奏员门春富用书包带上吊自杀，乐团“井冈山”成员、低音大提琴毕业学员依宏明以铁丝上吊自杀。此外，首席小提琴手杨秉荪等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杨被判刑十年，合唱队员王芄被判刑八年。同案未判刑但受到审查、批判的还有小提琴手盛中国、合唱队员查世超等。同时，近百位嫌疑对象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乐团两派造反派组织“井冈山”、“东方红”几乎全军覆没，成为“五一六”，有的先还在审查别人“五一六”后来自己也成了“五一六”，连与殷承宗关系很好的“东方红”头头邓宗安（样板戏交响音乐《沙家浜》创作组组长）也未能幸免，连文革前期只有八个样板戏时在交响音乐《沙家浜》中饰演郭建光的张云卿（乐团革命委员会中的“井冈山”代表）也成了“五一六”……

还有，进驻中央乐团的军代表，人虽不多，却也颇能代表当年卷入文革的

军人中的不同典型：第一批军代表是以三十八军李生林为首的工作组，他们将原中央乐团团长李凌等党委成员十八人打成“黑帮”加以批斗、夺权，却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灰溜溜地撤走。第二批军代表以北京军区唐义为首，唐义担任中央乐团革命委员会主任仅仅一年多，正在主持批斗与原中央文革“王、关、戚”有牵连的陆（陆公达）、王（王华翼，小提琴手）、曹（曹云汉）等原“井冈山”头头时，却突然被江青骂作“坏蛋”，以“杨成武的人”、“五一六”等罪名关进了秦城监狱，审查五年半。第三批是1969年8月进驻的军宣队，以康新斌（沈阳军区步兵师副政委）为首，进驻中央乐团后全力清查“五一六”，使其治下的那段时期“成为中央乐团四十年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而在这批军代表中，来自广州军区的四十一军一二一师、素有“爱兵模范”之称的团副政委郭凤林，却坚持像他在部队上“爱兵”那样爱护乐团的成员，尽可能对他们加以保护，因此他深得乐团人们的爱戴，后来被以乐团指挥李德伦为首的乐师们亲自上门热情挽留，成为唯一留在中央乐团的军代表，直至转业、退休。另一位来自广州军区四十一军一二二师的政工干部陈智则是另一种类型，在乐团时整人就不遗余力，回到部队后继续通过殷承宗向江青转交信件表示对在军内“放火烧荒”、“揪走资派”之类“路线斗争”的热情，后来自然遭到清查。

本书还披露了一些外人不了解的幕后情况，如1966年国庆节演出样板戏交响音乐《沙家浜》时，因指挥李德伦已作为“黑帮”打倒，是军代表安排双簧管手胡炳旭、大提琴手陈汝棠、小提琴手岑元鼎三位乐队队员分别指挥演出的（这大概也算世界音乐史上的“史无前例”）；创作样板戏交响音乐《沙家浜》的主要作曲家竟是一直被当作反革命嫌疑加以审查的所谓“裴多菲俱乐部大掌柜”罗忠镕（他在中共执政后认为建国大业已定，为专心从事作曲而申请退出中共，从此成为屡遭怀疑、整肃的“退党分子”）；而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创作主力，则是殷承宗从中央音乐学院拉过来的同学储望华（大右派储安平之子）；殷承宗因按照江青的要求推出钢琴协奏曲《黄河》有功，由江青和吴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迅速提拔为中央乐团党委第二副书记……还有，交响音乐《沙家浜》为何改掉了《新四军军歌》主题和周恩来喜欢的《智斗》一场，交响音乐《海港》为何在创作中途夭折，《二泉映月》为何突遭禁演，批“无标题音乐”风波的来

龙去脉，来势汹汹的批“行帮”为何正在劲头上却戛然而止……对这些与全国大形势息息相关的重要事件，本书都有详细的交待。

总之，本书内容十分丰富，作者紧扣全国的文革形势，处处联系着波诡云谲的高层权力斗争，对中央乐团这个“样板团”的历史，作了全方位的生动记叙，既是研究音乐史，也是研究文革史乃至共和国史的一部重要著作。

本书后面还附录了中央乐团大事记、中央乐团演出一览表、中央乐团主要录音一览表、外国交响乐队访华一览表等重要资料。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还附了一张光盘，被作者称为“绝响唱片”，它记录了中央乐团自建团以来不同时期演出的代表作品录音片断，比如其中就有文革初八个样板戏时期的交响音乐《沙家浜》的原版片断，据作者介绍：原版《奔袭》以《新四军军歌》为主题，而后来的修订版则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将前后两个不同版本比较，“原版音乐和演奏更反映文革造反派的热情和豪迈，尤其是乐队全奏和快速片断刺激奔放，战斗力十足，男高音张云卿饰演的郭建光原汁原味，一句‘此一去（呀）！’功架尽显，这是张氏作为‘井冈山’负责人被打成‘五一六’前的录音，是名副其实的绝响。”（光盘说明）

本书作者周光蓁，祖籍浙江，澳门出生，香港长大，专修中国文化史和民族音乐史。2003年在香港大学历史系以中央乐团四十年史为题完成了十七万字的英文博士论文。本书是在此论文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内容以中文完成的。作者用了整整十年时间查访已经四散世界各地的原中央乐团的老乐师和曾与中央乐团合作的许多音乐家，前后采访相关人员超过一百位，包括二十位指挥家，四十多位乐师（包括七位乐队首席，十四位声部首席），还有正副团长、党委书记、支部书记、军代表等多位行政人员（书中引用了这些被访者大量的口述），作者还花了大量时间在北京、香港的图书馆及美国的一些资料收藏机构埋头于故纸堆，发掘史料，搜集资料（其中有的是英文原文资料）。其间所耗费的心血是局外人难以想象的。捧着这部厚达 728 页、大十六开、装帧精美、内容与形式都十分厚重的书，不由得会对作者肃然起敬。

当然，因为作者长期生活于香港并主要以英文写作，此书的中文表述有些地方不大合于中国内地的习惯，有些外国人物的译名也与内地不同。此外，还有百密一疏的瑕疵，比如，书中写到文革中的中央文革小组时，一律写作了“

中央‘文革’小组”，将文革二字加上了不应有的引号，甚至在引用江青、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讲话时，如1966年11月28日文艺界大会上江青的讲话（204页。原文是当时各大报刊登的新华社通稿），毛泽东“三项指示”中那句人所共知的语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328页。原文出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周恩来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的一段讲话（281页。原文出自《周恩来年谱》），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写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这些讲话的原文都并未给“文化大革命”另加引号。这显然是按国家新闻出版署的要求（提到“文化大革命”时都要加引号）做得过分了。因为对文化大革命和文革加引号是表示当今主流舆论彻底否定文革的态度，却不是历史上有过的写法。（这一过分的做法不仅在此书中出现，内地出版的其他一些书中也常能见到类似的情况。）

此外，还有作者对相关历史了解不够出现的问题，如在第252页上引用谢富治的话：“学部（即教育系统）和文化部系统方面，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据点。”这段话原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但原文中并未在“学部”一词后加上说明性的“（即教育系统）”，显然这个说明是本书作者加的，但这就完全错了，因为“学部”并非指教育系统，而是当年一个十分有名的单位，全称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那时都简称“学部”，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北京一个呼风唤雨的重要单位，其能量不亚于首都三司，“学部”的造反派与中央文革的关锋等人有直接联系，在夺权后建立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办事机构中和《北京日报》编辑部中，也基本上是“学部”派去的人员掌权。以后清查“五一六”时“学部”也是个挨整的重灾区。

在“文艺界白色恐怖”一节中，作者对周恩来与江青在清查“五一六”问题上的表现作了简单化的区分，认为江青在搞扩大化，而周恩来反对扩大化，“亲自出来扑火”（249页），这样的认识当然可以算作一家之言，但对当年清查“五一六”运动稍作深入一些的研究便会知道这样的评说确实是太简单了。周恩来对清查“五一六”这一文革大冤案负有无法推卸的重大责任。

说到这里，不能不想到一个问题：本书作者是一个对文革情况不了解的香港学者，我们这么多了解或者亲历了文革的人们，为什么不能像本书作者这样也踏踏实实地拿出一些时间和精力进行人物采访、资料搜集和学术研究，写出同样的内容丰富而又翔实可靠的不同单位不同地区的文革史呢？我们不是更应该加倍努力吗？

周光蓁著《中央乐团史(1956—1996)》，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12月第一版。

【书评与序跋】

《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前言

程 光

1981年9月“公审”结束才不久，我的父亲邱会作被中央安置到西安。这是我十年后再能和他在一起，我们有许多心里话要说。

父亲流露出考虑已久的念头，要对往事作回忆，趁着年纪不算太老、脑子还好用时，把一些重要的事写下来，特别是他在中央工作的经历。我把那些年里所能看到的文件抄件给了他，是我在部队滞留时偷偷抄下来的厚厚两大本。我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我和父亲的心想在了一起。

父亲默默地着手工作。待安定缓和下来之后，一些老同志来看他，一些研究者来请教他，他们对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对活跃于彼时的人物，对神秘的“九一三”，有时谈得无拘无束，直率坦诚。

于是，在我的视野里，对于国家的那段历程，有一个世人耳熟能详之说，还有一个寓于当事人中的忆述。历史是多样、多元、多角度的，它们应当互相补充印证，去伪存真，构成科学的载体。然而，改革开放之前或初期的史著多是过于政治化的表述，难以承受后世的检验。但是，还有一些不随世态改变的记载，哪怕它是老干部议论的，亲历者忆述的，藏于民间的，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我萌生了保留它们的想法，开始对父亲谈的做些记录。

研究文革史实在难，不仅政治上太敏感，还因少有档案公开，文献记载不完整或多在尘封之中。出于种种原因，许多当事人不愿谈，或不能公开谈，或已是生命垂暮。还有一些受株连的知情者，至今心有余悸，很多话不会对外人说，而像我这样可以倾听他们的人，为何不珍惜？

在中国尚未从思想禁锢中走出之际，对于文革史，在纪律约束下，严谨科学的研究没有开展；面对政治审批，严肃认真的著作寥寥无几；而形形色色的“纪实”作品流行，成为民众了解那段历史的主要信息来源，并引导和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和政治压力。面对如此严峻气氛，讲出真相需要勇气。

对于父亲来说，已不再顾及那些，他要把所知留给后人。父亲一面写，一面看看这个参考，翻翻那个资料，有时用尽了脑子，却难于下笔。他说没想到写回忆这么难，像是头脑被约束着，感慨不已。而他和人聊天时，思想是那么放开，心胸是那么舒展，对于一些史实和人物，有时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那些没有人为修饰的忆述、议论、点评，往往三言两语就道破真相，一语中的。

父亲写回忆，一反他快人快语的习惯，常常反复权衡，思虑再三，生怕记得不准，往往斟酌文字，不轻易落笔。这与我们交谈时，那些从他记忆中第一个跳出来的史实，那些在他脑子里马上显出的场景，那些长久压在他心中要一吐为快的直言大不一样。

父亲到这般地步，还有约束他的吗？他说有，这就是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宁可少，不可滥；宁可精，不可杂；只可准，不可误。结果，他口述的很多内容，特别是他的想法、分析、理解和评判，要落纸时就小心斟酌，谨慎有加，惜笔了。

然而，针对一个话题，有一个谈话的对像，父亲会说得很好。他和那些来探望的老同志，和那些真心请教的研究者，和我这个乐此不疲的追问者，谈起来是那么流畅、深入、兴奋，而且，让他谈的问题越难越复杂，他说得越好越清晰，像是过去他打仗和工作，越是艰巨的任务，他完成得越是得心应手。

我从倾听中，看到了父亲内心的精神世界。父子聊天，成了我的向往和习惯。不知不觉中，我从一个听者，成了他的谈者，成了他交流的对像，成了他研究问题的帮手。我们从简单的说话，变成了心灵沟通，用父亲的话来说，没有“不可说的事”，也没有“不可说的话”。我们不受约束，没有忌讳，每当

他谈得兴起，不时迸出思想的火花；有时高潮迭起，说出一串一段精辟之语；若是激情来了，欲罢难休。

父亲很肯动脑子，非常勤奋，一生都在学习，哪怕是十年关押中也不中断。他到西安后，每天读书看报写作，坚持在八小时以上，还上了老年大学，当了个八十岁的“学生”。他喜爱对事情琢磨，总结归纳，见解常有独到之处。他年近垂暮，但思想一直不落伍，这让他周围的人非常惊讶。

为了协助父亲，我看了很多人物传记、回忆录和相关书籍，更请教了一些专家学者。有人强调，回忆录是忆述历史的实况，而不是思想的记录。当事人的反思，他的分析、理解，放进去未必合适。

但也有相反的观点，说当事人对彼时事件人物的看法、分析和判断，无论他那时的想法，还是事后的反思，也很重要。回忆录都是事后写的，是对往事的回顾审视。更何况，那段历史的知情人在世者已少，敢于负责地把它说出来的不多，一定要记录下来，作为口述历史传承下去。

几经思考，我对父亲谈的而没有下笔的那些内容，舍不得丢掉，因为往往对一个史实一个问题，他概括性的几句话语，精辟的一段评述，有如点燃了火花，让人感到突然一亮，如不记下，瞬间即过，逝于茫茫。

我决心把它们认真记下来，那是父亲和我心灵的交流，不仅是整理他回忆的参考，而且积在一起就是一本书，顾名思义就叫《心灵的对话》吧，我告诉了父亲。

从此，我不仅是被动去记，还找出重要的话题让父亲去忆想和谈论。历史科学如此浩瀚，在有形的往事背后，还有那些当事人的思想，彼时的观念，考虑问题的逻辑，潜在的规则，有些人们看不到却起某种决定作用的东西，也很珍贵。

还有，一些难于理解的问题，父亲不愿多费口舌解释，就说个小故事。用小事情说明大道理是父亲的擅长，可是有些故事难登大雅之堂，但收于“对话”则无妨了。

再有，“为尊者讳”是中华传统，著书立传均守此制。父亲在谈论时畅所欲言，但他落笔时则小心有加，说“要尊重历史，与人为善，能把事说清楚，其他的就不提了”。父亲评论的那些人，有的是受人敬仰的领袖，神圣犹在，

有的是父亲的战友，如同我的长辈。很多我记下来的想删掉，但不知哪些有用，哪些多余，就尽可能保留，让后人去评价吧。中国“思想解放”以来，对伟人的神话都打破了，还有何“为尊者讳”？世俗风行“扬长避短”歌功颂德，可待到历史真相恢复后，怕那是对尊者最大的不敬。还不如照实记下他们的言行，放在文革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去看，人们会有更多的理解和尊重。

1996年我因病在家中住了三个月，和父亲天天畅谈，“对话”形成了最早的初稿，第一个读者当然是父亲。他大略翻了一遍，对有关庐山会议的两大章约十万字读得细，说写得可以，就这样做下去吧，但不要成为他忆述的简单重复，要有自己的解读。

每年探亲放假，或借开会出差去看父母，我都要和父亲长谈。2002年春节，我在家半个多月。那些天里父亲心情非常好，说起话来敞开心扉，有时情绪上来，八十八岁的他真有青年人的劲头，有时聊得兴起，忘了吃饭、睡觉，家人催促，也舍不得结束。

或许是父亲悟到了什么，他说身体感到不如以前了。我看着他因长年写回忆而耗尽精力的虚弱身体，百感交集。我说，你的回忆，还有我记下的“对话”，近期难以面世，因为不可能通过严格的政审而得以出版。父亲说：“我们要面对审查，但不是他们那个审查。我们的东西，读者要审查它，历史档案要审查它，后人要审查它。既然写了，就不怕。那么现在的和将来的读者代表谁来审阅呢，是不是可以说代表了历史？到了彼时，现在那些审查官早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父亲还是那么风趣，他有句话让我铭刻心头，“我写下来说出去的，不是以某些人的政治好恶来取舍，而是以是否是真实而保留。有些实话真话，今天不许说，或是说出来让一些‘大人物’不中听，我就写好了放在那留给后人。”

我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我和父亲最后的长谈。五个月后父亲突然因病去世了。病危之际，他作了喉管切开，不能说话，隔离在重症监护室。在他弥留之际的一个清晨，值夜医生说，昨晚你父亲有过清醒意识，他很想说什么，但无法说，他咬烂了自己的舌头……

我的心被震撼了，我知道这是父亲最后的嘱托：他有话要说，他不愿意永

远被封住口舌！

父亲这辈子太不容易了，特别是他的晚年，度过了一生中最艰辛的岁月，他为了心中崇高的目的付出最后的心血和生命。我把父亲的遗像放在书桌上，每当我整理“对话”时，让他看着我。我翻阅着父亲的谈话记录、录音稿、手迹、信件，他的音容笑貌犹如就在我面前，用慈祥的眼睛看着我，和我述说。

父亲走了，但时代在进步，经过努力和众人的帮助，我终于能把《心灵的对话》奉献给读者。之前，我曾很不安，不仅未必“合乎时宜”，更因为它是在缺少资料，难于与原始档案核对的情况下记写的，是一个居家老人与儿子述说的心里话，只是一家之言。然而，给了我勇气的是父亲的一句话，“我们的东西会有瑕疵、不足，但比那些时间地点少有失误，而关键内容错了误导人的东西可是好多了，人们需要听到真话。”

《心灵的对话》难免有疏漏之处，少不了差错和误笔，也没做到“为尊者讳”。但是，出于对历史的珍惜，对前辈的敬重，我仍然把它献上。不当之处，请读者见谅，宽容待之，予以指正！

2010年4月于江西兴国

程光著《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4月第一版。

【书评与序跋】

《李作鹏回忆录》前言

李作鹏

年青人爱向往未来，老年人爱回顾往事。闲来无事，尤其如此。

在我刑满到期尚被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时，中共中央对我有若干条特殊规定，其中一条是战争年代回忆录可以写，可以发表；文革年代回忆录也可以写，但发表要经审查。现在我已经完全恢复了公民权利，应该享受国家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如果书稿写好后由于某种原因，仍然不准发表，那我的这本

回忆录就只好存给老鼠啃掉。

我想强调一下我思考与写作这本书的几条原则：

第一、我的写作目的，就是要为后人留下一段我亲身经历的、实事求是的客观真相。虽然我的亲身经历仅仅是全部真相的一个侧面，但为了让这段复杂的历史还其本来面目，我想尽自己微薄能力，作一点贡献。我们的史学家如果全面系统地把诸多历史事件的不同侧面贯穿起来并研究透彻，提炼出其中的历史借鉴，不是很有好处吗？

第二、我的回忆录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林彪。林彪是中国共产党和共和国历史上一位非常特殊、非常敏感的人物。我始终认为，对林彪的功与过应该分开看待。历史一定会还一个人的本来面貌，给一个公正评价。只有真正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个道理和事实，我相信会随着时间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因此我也想为史学家们对林彪的研究留下一些可供参考的资料。

第三、我是一个经受了毁灭性打击的人，现在一无所有，只是一个普通公民，剩下一条快死的老命。面对历史上的是非功过，我没有什么可怕的。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军人，当兵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为了真理，为了国家，砍头只当风吹帽。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应该用无所畏惧的精神来追求历史的真相。因此我除了实事求是地还原事情本相，别无选择。

第四、我的大部分稿件是在服刑“保外就医”和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构思写就的。当时我的写作处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的全部原始资料因被数次抄家而失散了。中央档案馆中的历史档案文件，我不能查阅。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只能够依靠自己脑子里的回忆，和参考公开发行的有限资料，所以我不能保证文稿中完全没有差错。但是我相信自己多年来从事高级参谋职业锻炼的结果，虽然已临届九旬，至今记忆力并不很坏。况且我的写作态度一直是慎重的。没有相当把握是决不会轻易见诸于文字的。脑袋中的记忆有的清楚一些，所以有的时期写的比较细一些，有的记忆模糊一些，写的就比较粗一些。

我知道历史必须实叙其事，禁止伪言浮文。在重要的问题上，每个字、每句话、每个过程和细节都要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否则是不严肃的，

不郑重的，是骗人骗己的。

我写作的主导思想是弘扬我党历史上好的、光明的一面，但对于缺点、错误和失败的一面也不回避。我始终认为两点论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我坚持这一观点，并付诸行动。

但个人的经历毕竟是有限的。“足所践者少，其不践者多；心所知者寡，其不知者众。”因此其中错误之处、不充分、不完善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指正。因我读书少，文化不高，缺少文采，文字语言比较枯燥，比较生硬。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甚至词不达意，用词不当，这是明显的缺陷。

我的回忆录大致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革命战争年代。主要包括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

这一部分纪录了我从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在革命的大熔炉中锤炼了二十年后，成长为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的经历。我想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现在的人们，新中国的建立是来之不易的，对于后人奋发建设现代化国强民富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也许能起到鼓励和鞭策的作用。

第二部分是建国以来至 1971 年“九·一三事件”。

从 1950 年开始，我先后在武汉高级步校工作、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以及在总参军训部任职。在这十二年间，我既接受了严格的高等军事教育，也参加了教书育人，培养部队干部的工作，为训练部队提高战斗素质，适应现代战争需要，实现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1962 年我调到海军工作后，分管作战和海防工程建设。我贯彻执行了毛泽东、林彪及中央军委关于部队建设的方针原则。指挥打击了美蒋军从海上、空中向大陆沿海的窜犯袭扰，击沉击伤敌舰多艘，击落击伤敌机多架。指导进行海军码头、机场等战备工程建设；领导包括核潜艇、导弹驱逐舰、万吨级海洋考察船等的建造，使海军建设向现代化方向发展。

文革大革命已经成为历史。文革十年，我经历了前五年。书中重点写了文革前期我之所见所闻、所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的实际情况。在叙述过程中，尽量保持历史的真实面貌，没有更多的评论，采取述而不论、述而少论的态度。供读者参考，相信读者能够分析、辨别是非黑白。

“九·一三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大事，是建国以来的大事，是文革时期的大事，也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想必也是读者十分感兴趣的内容。在书中我将如实讲述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

第三部分是我被中央隔离审查，判处徒刑的经历。

书中如实写了1971年9月24日之后，我被宣布隔离审查，在通县“马厰”里被囚禁五年，又在秦城监狱里被关押五年的经历。1980年底和1981年初，又经历了特别法庭的公审和判决。我由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变成了囚徒，服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这是一段漫长的岁月，是一段无比痛苦的历程。

在写回忆录的同时，我开始整理历经劫难，终于保存下来的一千多张珍贵历史照片。

由于这些历史照片在中央专案组也被整整“隔离审查”了十年，有的严重霉变和粘连，有的照片中的某些人脸，被用墨汁涂黑或是打上红叉，有的照片被剪开后又和别的照片粘贴在一起，损坏了不少珍贵历史照片，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我真的很心痛！

在书中，我选用了一百多张珍贵历史照片作为插图，绝大部分历史照片，是从来未公开发表的，是十分宝贵的历史资料。

参加红军之前，我念过几年私塾，识得几个汉字。这就养成了我写打油诗的兴趣。我称其为“草诗”。我整理出百余首发表，诗言志，诗言情，诗言趣。读者喜欢就看看，没兴趣就一翻而过。

存在决定意识。笔者作为一段历史的见证人，我相信人民创造历史，时间是历史的法官。凡事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好事可以化为坏事，坏事可以粉饰成好事。但人民有澄清是非的头脑，有表达公平正义的要求，这是压不服堵不住的。不平则鸣，因此我有“民断胜官断”的诗句。没有永远乌云不散、阴雨不晴的天，终有一天，万里白云晴空。对不对，走着瞧。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参考和学习了大量资料，谨向原作者致以衷心的感谢！

李作鹏著《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4月第一版

【文摘】

关于毛泽东不让江青进政治局 ——读《邱会作回忆录》的一点感想

阎长贵

《邱会作回忆录》第一次比较详尽地披露了九届一中全会酝酿和选举中央政治局的情况，其中特别谈到毛泽东不让江青进政治局的事，说毛泽东两次划掉政治局委员候选名单上江青的名字。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很值得讨论一下。

1969年4月24日九大闭幕后，接着就应该举行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可是却拖了几天，到28日才召开选举中央政治局的九届一中全会。在这几天的时间里，主要就是酝酿和准备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4月25日毛泽东决定让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组成三人小组提出一个二十五至三十人的政治局委员以及常委的名单，再进行选举。他们第一次提出了二十三人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上报毛泽东——在这个名单上有江青的名字，没有叶群的名字。

4月26日下午毛泽东看到上报名单，他基本满意，“只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加上了叶群”（见该书第650页，以下只注页数）。

“林总看到名单（指毛泽东已经看过的名单——笔者注）后，在叶群的名字上面划了一个大叉，但林总没有加上江青”——对此邱会作评论道：“这真是神来之笔，可以摸摸主席对江青究竟是个什么态度”（651页）。

《邱会作回忆录》接着叙述了三人小组对毛泽东和林彪看过的名单的意见。

在三人小组会上，周恩来说：“我看到主席、林副主席在名单上划去的名字，但我们还是要考虑的。我们坚持把这两个人都列上，这也是从当前大局来考虑。”——总理在名单上又加上了江青、叶群的名字。（651页）

康生说：“总理的意见是对的，但困难比较大，我们硬着头皮留下来。”（651页）

黄永胜说：“我同意总理和康老的意见。”（651页）

这份又加上江青和叶群的名单再上报毛泽东。

“在新的名单上，毛主席还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在名单的旁边写上李德生、纪登奎的名字。”（651页）

“林总同上次一样，收到名单即在叶群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651页）

26日晚上三人小组继续在一起工作，主要是谈论江青、叶群两人的问题。

周恩来说：“整个名单就是江、叶二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整个名单就定下来了。从当前的情况出发，江青、叶群一定要进入政治局。要从政治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诚恳表示我们的态度。我们三人，明天上午向主席汇报，十二时向林副主席汇报，争取在明天，把问题分别谈妥。”（651页）

27日上午十时，三人小组到了毛泽东住处。

周恩来说：“我们诚恳提出江青同志一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之内。把她列入固然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不列入也会产生政治影响，甚至会产生更大的政治问题。权衡利弊，我们提议一定要把江青列入候选名单之内。”（651页）

毛主席：“你们要那就要吧。不管怎么说，列上了责任在我身上，就这样吧。”（651页）

周恩来等三人就到林彪家里去了。

周恩来说：“关于叶群同志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的问题，从现实的政治情况来考虑，我们三人认为一定要列入，否则会产生另外的政治影响，请林副主席同意我们的意见。”（651页）

黄永胜接着说：“我们刚才到主席那里去了，对江青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毛主席基本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建议对叶群的问题，你也同意我们的意见。”（652页）

康生说：“总理，黄总长把我们研究的意见都说了，请林总从政治上考虑，同意我们的意见。”（652页）

林彪：“无论同意或不同意把叶群列入政治局候选人，我都听从毛主席的决

定。”（652页）

最后，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在毛泽东住处开会，九届中央政治局候选人的名单定下来了，接着他们五个人都在这个名单上签了字。4月28日下午九届一中全会按照这个名单“选举”产生了九届中央政治局——当时是“等额选举”，不是差额选举，只要入了候选人名单也就是板上钉钉了。

这就是《邱会作回忆录》告诉我们的九届中央政治局产生的过程，也是江青、叶群进入政治局的过程。我所以不惜篇幅把邱会作所说的比较全地引录在这里，是因为它太宝贵、太难得了，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记叙——而这在档案中是查不到、也不可能查到的；如果不是邱会作把它写出来，就湮没了，那将是何等遗憾和可惜的事情啊！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毛泽东两次把江青名字划掉而添上叶群名字这件事情？对毛泽东这样的大政治家的这种做法，无论如何不能简单和表面地看，要想得深些，再深些……现在已经有了不同的看法，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毛泽东为什么把江青的名字划掉？有人说：“根据毛泽东一向卸磨杀驴的做法，九大之后不再需要江青‘冲锋陷阵’了，她也可以‘退休’了。不要说政治局常委，就是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也不想给她，给她个中央委员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了。”（舒云《喜读〈邱会作回忆录〉》系列文章中的《邱会作眼中的九届一中全会》）

毛泽东为什么把叶群的名字加上？有博主分析：“毛泽东本意是想把叶群列上政治局，因为林彪老缺席，叶群代表林彪名不正言不顺。如果叶群是政治局委员，自然就代表林彪了。这是毛泽东的长远用心。毛泽东不想让江青进政治局，但是他光提叶群，不提江青不行。江青不进政治局，叶群进政治局也不那么妥当。所以，毛泽东转弯了。”（舒云《喜读〈邱会作回忆录〉》系列文章中的《邱会作眼中的九届一中全会》）

他们的看法和分析符合毛泽东的本意吗？我看很值得商榷。

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还当过代理组长，是中央文革小组掌实权的人（组长陈伯达自称是“刘盆子”即傀儡）。试想：连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时排位副组长最末的张春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最末的姚文元都进政治局，而江

青不进，这合适和符合当时的舆情吗？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张春桥、姚文元不可能和江青相比。在这种情况和条件下，毛泽东划掉江青的名字能够是真心实意的吗？他在“九大”上明明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没完”（实际上持续了十年多），而对江青就不再需要她“冲锋陷阵”却采取“卸磨杀驴”的做法，让她“退休”吗？“三人小组”，特别是牵头人周恩来，在第一次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上所以列入江青的名字，恐怕主要就是因为江青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划掉江青的名字，对这事，“三人小组”，特别是周恩来——举世闻名的大政治家，能够想不到（或不猜想）毛泽东的真心实意，在实际工作中能不为难吗？

至于毛泽东把江青的名字划掉而把叶群的名字加上，恐怕更有深意存焉。难道他不清楚叶群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完全不能和江青相比（特别在他心里），那他为什么划掉江青的名字而加上叶群的名字呢？我看，恐怕根本不是如那位“博主”说的什么好让叶群“名正言顺”地“代表”身体不好的林彪的“长远用心”。如前所说，林彪看到毛泽东划掉江青的名字而加上叶群名字的名单后，他在叶群名字上“划了一个大叉”，但“没有加上江青”；邱会作评论道：“这真是神来之笔，可以摸摸主席对江青究竟是个什么态度。”由此我们也可以说，毛泽东划掉江青的名字而加上叶群是不是要看看“林彪对江青究竟是个什么态度”？——这些大政治家、军事家的心思深不可测，往往不是我们平常人所能想得到的。我猜测，毛泽东所以把江青的名字划掉而加上叶群，恐怕是为江青进入政治局做“铺垫”——是一种“最巧妙”而又最直接和最实用的“铺垫”。

在三人小组又把江青、叶群加上后的名单上报，毛泽东再一次“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在名单旁边写上李德生、纪登奎的名字”。同上次一样，林彪收到毛泽东看过的这份名单，又“在叶群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这样一来，就把江青进不进入政治局这个“大难题”留给三人小组，特别是留给周恩来了。周在三人小组会上说：“整个名单就是江、叶二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整个名单就定下来了。从当前的情况出发，江青、叶群一定要进入政治局。要从政治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诚恳表示我们的态度。”接着，他们这样做了，如上所说，也“终于”取得了毛泽东“以及”林彪的同意。

关于毛泽东不让江青进入政治局的事，“九大”期间任江青机要秘书的杨银禄也谈过。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主席开始不愿家里人进中央委员会，更不用说进政治局了。‘九大’期间，开始酝酿政治局委员名单时，是有江青的，主席给划掉了……江青后来进政治局，康生起了很大的作用。九届一中全会选政治局委员，当时安排人事工作的三人小组，分别是总理、康生和黄永胜。最后确定名单中加入江青后，康生第一个去给江青祝贺，一进客厅就用浓重的山东话大声说：‘行了！行了！’江青出来和他握手，说：‘谢谢康老！康老是我最好的老师。’康生说：‘江青同志是我最好的学生。’江青进政治局，康生和总理的作用很关键。”（参见《凤凰周刊》2011年第6期李明三《江青不是孤立的一个人》）

杨银禄的上述叙述和看法，在《邱会作回忆录》650页中也提供了一个佐证。在第一次确定有江青名字的政治局委员名单时，黄永胜说：我开始一点不摸底，我表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功，但不一定要当政治局委员，这是为了主席，为了大局。康生一听我的话就火冒三丈。会后总理跟我说：“你太不懂了！”不懂什么？总理也不讲。——“不懂什么？”周恩来这时在这里没讲，但从《邱会作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恐怕就是周恩来后来一再告诫成为政治局委员后的黄、吴、李、邱的所谓“中央政治”。什么是“中央政治”？周恩来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680页）

对这个问题，即江青进入政治局的事情，我看还是邱会作的认识和分析深刻、精辟。他说：“江青进入政治局应当作何解释比较符合历史情况？虽然在组成政治局的过程中，负责组织工作的三人小组，自始自（至）终都是建议江青进入政治局的，但这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毛主席，不管毛主席愿意不愿意，没有毛主席的点头，江青是绝对进不了政治局的。但是有人认为，毛主席是因为个人因素把江青塞进政治局，这也不对。毛主席不会这样做，我认为他点头让江青进入政治局，还是从文化大革命的角度来考虑的，当然也有主席对今后政治局的考虑。至于叶群进入政治局，无须多说，她是江青进入政治局的‘陪衬’。江青不进入政治局，叶群连边也沾不上。”（658页）——对这一点，特别对人们（尤其是周恩来等人）会想到这一点，毛泽东也是心知肚明的

，所以说江青列入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的事，“不管怎么说，列上了责任在我身上”。这是毛泽东说的一句大实话！

此文原已编入本期，因《华夏文摘》增刊 796 期·文革博物馆通讯 628 期（2011 年 4 月 18 日出版）在本期发表之前刊出，故将其改为文摘。

【文摘】

谈“被利用论”

程 光

按：本篇节录自程光著《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第一章“风云初起”第一节“动乱前夕”，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文中的父即邱会作，子即邱会作的儿子程光（邱承光）。

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命运，它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影响将延续很长时期，并会作为特殊的文化遗产留给后世。

父：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对我的命运也起着重要作用，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改变了我的后半生。文化大革命之初，我是高级干部中受残酷打击最沉重者之一，被造反派武斗几乎丧命；在中期，我进入了中国权力高层，参与了中央工作；在后期，我又受到严酷的整治，先是受到令人发指的人身折磨，最后又在政治上被置于死地。

子：从文革中这样走过来的人极少，像你这么典型的几乎绝无仅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珍贵。

父：正是这种经历，使我能从特有角度审视文化大革命及以后的中国，并反复思索之前我走过的革命道路。

子：1981 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决议》）是国内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权威文件，现在相关的政治、历史、文化论著，都必须遵从它的精神。

父：《决议》是重要文件，而不应该说它是权威文件。权威可以来自真理，也可能来自权力。对于历史问题的研究，如果刻意使用权力，往往会偏离真实。

子：古往今来的帝王对史学也不太敢用权力，即使用了也无效。否则我们就看不到《史记》等一大批记载中华民族历史的优秀史书了。

父：说《决议》是重要文件，比把它当一个“权威”更准确更科学。

子：说到科学，历史是一门社会科学，有其自身的研究方法和规律。历史还是一门实证科学，人们只能去研究探索，看自己的东西符不符合历史，接受科学的检验。

政治化地对待历史，源于苏联共产党，《联共（布）党史教程》是典范。随着苏联 1991 年解体，以一党之史、一派政见当作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历史结束了。以前的最高“机密”档案被解密，包括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记录都公开了，真相大白于天下。原苏共编写的“政治化”历史著作和众多的“历史决议”，不再是解释俄罗斯历史的权威了。

父：你这里说的是历史文件，还有一些当事人，不管是被打下去的，还是曾被封住嘴的，还是站出来说真话的，他们对揭示历史真相的作用也不可小视。

子：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失，在一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决议》阐述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错误地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父：不妨称这个观点为“被利用论”吧！它是《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核心论点。

子：“被利用论”？很传神！它是当前史学研究必须贯彻的宗旨和遵守的政治标准，许多观点、立论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

父：《决议》说毛主席被利用，说我们在利用他，根本没那回事儿！毛主席那个人呀，谁的话他听得进去？谁又能利用他呢？我不敢，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周恩来也不敢呀！别说是利用他，毛主席想要干的事，别人是不可能挡得住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他就不是毛泽东了！

毛主席是非常刚毅、异常智慧、具有强烈个性的人，一生中只有他利用别人为他和他的事业服务，哪有他被别人利用的道理？特别是毛主席后半生倾心投入的文化大革命，被他视为评价自己一生最大的两件事之一（另一件是建立新中国），如果说他一直在“被利用”中，既不符合实际，也无法令人信服。

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他晚年严重的错误。可悲的是，直到他去世前，还以为这是他为中国人民和全人类作了一件堪称与中国革命胜利相媲美的伟大事业和理论建树，嘱咐他的继承者今后每隔七、八年就要搞一次。

父：毛泽东的错误不仅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还在于坚持了文化革命。在大家都认为是错误的时候，他一味坚持搞下去，并对妨碍他搞的人实行打击和清除，铸成后人很难原谅的大错。

子：尽管人们对毛泽东的这些错误有认识，但他仍是中国共产党人高举的旗帜，被当作建立新中国的伟人。现在对他的错误进行评论，一定会受到人为的政治影响，难免避重就轻，向别人身上推诿。

父：重大的社会事件，特别像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一定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推出毛泽东“被利用论”，会掩饰历史真相，不利于对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和教训进行本质的研究和揭示，不利于总结经验。

子：怎样才能客观正确地研究这段历史，同时也真实地评价你个人的生涯呢？

父：总得按历史科学办事，摆事实讲道理吧！？总得认真分析研究，得出科学结论吧！？我想，除此之外，其他的路是没有的。

文化大革命早已过去，作为当年的当事人，我现在心态是豁达和平静的，把过去的恩恩怨怨，个人功利抛在一边了。我想，任何一个人，无论是“神”，是“鬼”，是人，都要在历史的面前交待自己的所作所为，说出实话，亮出自己灵魂深处的东西，接受历史的检验。

子：如果谁人以为自己位高权重，一贯正确，无人敢碰；或做事非常隐蔽无人知道；或垮台倒霉了嘴被封住，惧怕挨整不敢说，这都错了。谁都无法逃脱历史的严格、严肃、严厉的审问。

【文摘】

童年的恐惧与仇恨

野 夫

一.

在我而言，企图从对家族的考察以及对个人成长经历的回顾，来反映 20 世纪后半叶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以期更全面地弥补宏观叙事的不足，使后人得以窥见大事记背后所隐含的无数微弱生灵的奇特实况；这一动机看来是愚蠢可笑的——因为历史的公正和客观，要求记录者淡忘一己的悲欢好恶而进行超越道德的批判——这，不是我所能轻易做到的。

我在 19 岁时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在一个醉酒的黄昏醺然穿过 1982 年的小城深巷，我突然遭遇了我童年的仇人——他佝偻地站在路灯下，潦倒而苍老。我从 5 岁开始便牢记着他的面孔，那时他把一挺插上弹仓的机枪架在我家门口，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着我的父亲。我在外婆的膝间瑟瑟发抖，不知道那喇叭花一样的枪口何时会喷吐。

以后我知道了他的名字，是父亲煤矿的造反派头目。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为我童年的恐惧而羞愧，这种羞愧渐渐被岁月熬制成一种仇恨。我难以原谅他对我善良亲人曾有过的巨大侮辱以及对我——一个孩子的伤害。

但是早在我成为一个青年以前，他就被矿山开除了，我也渐渐淡忘了对他的怀恨。而这个夜晚当他重新出现在我被酒精点燃的眼中时，我潜伏的恨意顿生。他不再是一个被生活折磨得瘦骨伶仃的衰朽老人，我看到的仍是十五年前的邪恶画面。我杀机四伏地扑向他一顿暴打，他永远无法想象这场横祸究竟因何而起。

二.

很长时间来，我一直为我青春时代的狂怒心存内疚，并由此开始思考关于文革的问题。

我的故乡是一个四省交界的偏远小镇，即使今天依旧交通闭塞。外地人很难想象文革之火，竟然也会燃烧到这样的角落。

1966 年的夏天我只是一个初有记忆的孩子，但恐怖的画面却会让人终身刻骨。那年持久的旱季使河水蒸发出一种死鱼的腥秽，瘴气盈满小街。突然某个午后，河面上浮起密密麻麻的水蛇，摇动着黑压压的扁头，河水顿时浑浊如汤。全镇人目瞪口呆地面对如此奇观，仿佛大祸将至，遂倾巢而动手持竹竿朝水面乱打，无数死蛇被挑上河岸。人蛇大战一直持续到黄昏，一场暴雨才终于结束这次血腥屠杀。

小镇的文革之火事实上是由早先考到省城读大学的几个学生回乡点燃的。此前人们只知道山外又在开始一场运动，其具体形式和对象皆不明了。若干年来的运动都是对草民的加害和作弄，因此对这所谓史无前例的新的革命皆无兴趣。

这几个大学生是小镇的凤毛麟角，他们在都市学习和洗脑，必然要成为时代精神的先锋和代表。他们秉承一个伟大意志，仿佛怀揣真理，以一种神圣的使命姿态回来，要把小镇拖入历史轨道并与时代保持同一节奏。只因他们有知识，所以他们比镇长更能诠释“封资修”的涵义。没有谁敢于阻挡他们率领一群学弟学妹去焚烧图书室，去砸碎寺庙和老屋的石雕木刻。尤其当人们看见他们可以把土皇帝一般的领导押出来批斗，竟然无人干预时，被压制多年的人民终于找到了泄洪的缺口。

三.

我的父亲当时是一个小煤矿的矿长，他是一个严肃认真的管理者，除了脾气急躁偶尔骂人外，基本可谓共产党内的好人。那个夏天，我突然发现他头戴一顶纸糊高帽，十分滑稽地走在街上，而他的身后则跟着一大队扛着刀枪的工人。我兴冲冲地跑回家要拉外婆去看父亲的化装游行，却看见母亲的泪眼——从此，我们被带进了一个惊恐而压抑的年代。

街上新修了灯塔园，那是模仿延安宝塔的建筑，是那个时代普遍流行的批斗台。家父则成了那石阶上的常客。他在烈日下颈挂沉重木牌，弯腰 90 度汗如雨下的痛苦造型，成为当时小镇的一道风景。母亲实在不忍，用玻璃瓶装上凉茶让我和姐姐送去，我从大人的脚缝中钻进去叫父亲喝水，却被扭着他手臂的

人抢去喝光然后将瓶子砸碎。

那个时代，每个基层单位都有武装部，充满了各种二战时期的武器。被发动起来的群众开始有恃无恐地抢劫这些枪弹武装自己，他们似乎突然回到了大革命的农民运动时期，一切无政府主义的行为皆成为时尚。

我看见邻居的泥瓦匠在每天擦他的手枪，铁匠天天在打造梭镖大刀，平时老实巴交的镇民忽然都变成了戏剧人物，各自扎着皮带戴着袖标斜挎着盒子炮在大街上巡回，仿佛暴动或起义在即，生活一下子被拉进了战争岁月。母亲是供销社的会计，一个右派却要负责财务报销审核，现在那些造反了的同事来报账，都是先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我们每天都在战战兢兢中进入黑夜。

但并不是每个夜晚皆能安睡。常常最高最新指示又从北京传来，全镇要举行火炬游行欢庆，家家得自备竹筒煤油火把。又或者警报尖叫，说是苏联的坦克已开到邻县，全体镇民要钻山洞备战。再不然便是抄家的队伍来突击检查，看谁家在收听敌台。在一个孩子的眼中，仿佛所有的大人皆在彩排一幕惊恐剧，但那时的父母却是实实在在地惊恐，害怕我们遭遇流弹。

我亲眼目睹过两次武斗。一次是传说四川万县的“黑色派”要来血洗利川，镇上的武装民众在 318 国道上架设铁丝网和机枪，并埋下地雷。我至今都无法想象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那些电影里的利器，他们真诚地要为遥远的毛向另外的毛信徒大开杀戒。还有一次是一群饥饿的知青来洗劫了镇上唯一一家饭馆的馒头，全镇老少大打了一场巷战，像追杀日本鬼子一样将几十个年轻的男人全部打瘫在街上。

我的童年就在这样的恐惧中度过，还有许多惨剧无法在此一一叙述。这只是中国最偏远的外省边镇的文革闹剧，而且此镇历来都是民风淳朴与世无争，却在一个非常年代同样演变成为一个血腥的杀场。

四.

所有的罪恶都应该有个起点，那小镇的恶魔又是谁给放出来的呢？是那些大学生吗？

迄今，我仍不能怀疑他们的初衷会有什么卑鄙的目的。在我 78 年上大学开

始与许多老红卫兵成为朋友之后，我逐渐加深了对那一代人的理解。他们最初是深怀某种高尚纯正的使命感的，“以天下为己任”、“改造世界”这样一种教育模式，把每个青年学子都鼓动成政治家一样目空一切。他们并不单纯，至少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幼稚。只要仔细研究整个文革期间由这些青年所导演的无数派性谋略和战争，就可以相信他们远比今天的学生聪明而复杂，更富有实践操作能力。然而，他们的成熟往往表现在具体斗争的算计上，他们缺乏对那个伟大意志的准确把握，没有吃透这场统治者要造自己的反——这种确实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实质。同一个天音，往往使他们幻化为完全敌对和矛盾的两种行动，这种热情盲动的本质是缺乏世故的轻生躁进。

动机不错的行动并不能保证其结果的正确。这其中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隐而未见的现实——那就是在文革之前，这个民族已经经历了太多运动折腾，递增的斗争带来的是经济的倒退。天无宁日，哀鸿遍野，对普通平民的一系列剥夺和强制早已怨声载道。然而，伟大的专政机器又确实让人敢怒不敢言。在积怨中他们看见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建立在平民的牺牲之上，官僚主义盛行于各政府部门，一个民族的正常神经早已衰弱且濒于疯狂。个体的人在沉默，集体的火山却正在形成。人民在期待一场大的社会变革，而不管这场变革会导致什么结局，只要能一泄二十几年的怨愤也不失为一种痛快。

当此之际，天音颂响——要打倒一切当权派。人民无法不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神的旨意和草民的积怨暗合，苍天当死黄天当立，振臂一呼从者千万，这样的革命怎么能不吸引那一代胸怀天下志存高远的人呢？试想换成今天的我辈，能不风随景从吗？人与人的互相残杀开始，所有的基层官僚无论功过善恶，都将分担组织的责任而成为冤鬼。所有人几乎都忘记追问——谁是真正的当权派，谁真正应该被打倒。即使到了今天，连这个党都承认这是一场“浩劫”了，可是真正的始作俑者却依旧要作为神器继续祭起。

五

几个大学生在点燃小镇的文革之火后又回到了他们的大学，但火势却不会就此湮灭。当运动从“封资修”到“当权派”，再蔓延燃向知识分子时，他们

被发配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最后又被分回他们的故乡母校，开始漫长的被阉割的生活。这个小镇已经起来革命的群众，早已忘记了他们曾经是革命的发起人和引导者，于是他们也很自然地成为了革命的目标。当他们意识到这场运动被导向一个有违初衷的悲剧性深渊时，他们已无能力去扭转，甚至连自救尚不及。

在去那场最初的火光之后的二十年，我与其中的一个大学生——古老师成了朋友。他已调到县城一中，是本地最优秀的英语教师，他的许多弟子都相继考学出山，成为小城新一代风流人物。而他已默默无闻满头秋霜了，当年的壮怀激烈早已沉淀为现在的波澜不惊，宠辱俱忘。在一次酒后，我向他提及我四岁时所围观的那场焚书之火，以及我幼年对他的景仰，还有我的恐惧和仇恨，他付诸一笑说——毛早就告诉我们：玩火者必自焚。

但是，在那场运动中被彻底玩弄了的究竟是哪些人呢？

我们可以承认，知识分子确实在反右时被玩弄了，但在文革中，我认为真正被玩弄和伤害的却是那些普通草民。他们稀里糊涂地被青年学生带进一条报复社会的道路，文攻武卫，挑战秩序和权力，最后，又被戴上暴徒的荆冠，弃置于万恶深渊，一直不被主流话语所真正认识和怜惜。

六

现在我要回到开篇时我所暴打的那个仇人身上。

因为我在酒醒后的内疚，我决定暗访一下他的生活。他真名叫周某某，文革时原是煤矿的一个普通合同工人。出身贫苦，没有文化。那时的工人阶级虽然号称是领导阶级，实际上该下地狱的还是要下地狱——幽深黑暗的矿井在今天仍然还是吞噬生命的血口，况乎当年。

他有沉重的家庭负担，有嗷嗷待哺的孩子，有日复一日的井下辛劳，却没有足够敷家的工资和安全感。这个社会从未给过他真正的温暖和平等，更莫想奢谈什么公正，他当然有怨恨。许多他的同事可能都勉强忍耐，他却比别人多了那么一点血性和要求，而这，正成了他日后的祸根。

文革，对许多积怨已久的底层人来说，都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大好时刻。他

们拥护毛是因为毛要他们去夺权，去砸碎一切法权。这个制度的全部弊端和过错，不由总设计师负责，却要让各级执行官员来承担。那么，周的造反就必将是应运而生的事——上合天意，下符己愿。而他针对我父亲的迫害和泄愤，也就自然而然。

他的问题在于他和那时的多数读书人一样，都不清楚谁是真正的敌人。如果再调动出人性中的恶的话，那就会像纳粹一样，施暴于无辜的百姓。他会用电线搓成皮鞭随时打走资派，会想出许多残酷的方式折磨他的假想敌，会去勇敢地抢劫武器来组织武斗，使其他苦大仇深的阶级兄弟倒于血泊——这几乎是文革时多数风流人物的普遍悲剧——在运动的后期，他们被抓捕，被清除，被历史所彻底抛弃。周也难逃覆辙，失去工作的机会，靠拖板车拉石头养家糊口。一次下坡刹不住车，他又被自己的重车压断了一条腿，成了残废。

他有三个女儿，大的俩都嫁在农村，自顾不暇，只有三妹失学在家陪着他，老伴也早已不在。就是这个三妹，在 80 年代成了山城的名人——为了生活，她只能做暗娼养家，于是不断被抓，后来去特区当了新中国第一代妈咪。

文革结束许多年了，而对他，对于他的家来说，灾难还在无限延长，还要继续承担这个国家玩笑的巨大后果。

七

我唯一保留的一张老照片，是我和大姐在 1970 年的合影。那是在四川万县的一家红旗照相馆，我八岁，大姐十五岁。

十五岁的大姐初中毕业修了一年水库，母亲还是决定把她送回原籍江汉平原下乡，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成绩优异的她依旧不能获准上高中。父亲被打倒了，母亲是右派，在当地下乡则永无招工的可能。父亲第一次带我出远门——送大姐到万县码头。那时山里小镇没有照相馆，父亲似乎也不知道这对儿女何时再见，便破例带我们去照了这张像，相片上加了一句手书——我们姐弟永远忠于毛主席。

许多时候，我翻出这张相片都会发笑——那种傻样，那种庄严，那种毫无来由的愚忠都让我忍俊不禁。当我读出我父亲当年的苦衷时，我油然而生一种

惊触——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啊。我怎能相信父亲真的愚蠢到不知他的女儿，正因为毛而失学，他正因为毛，而要承受漫无边际的侮辱和伤害。但是在那个年代，他别无选择，他像多数人一样要学会愚蠢以求自保。

1949年鼎革以来，全部宣传和教育都围绕如何愚忠来展开。谁要坚持在常识的立场上说话，也难逃厄运。而这种愚民政策，在文革时达到顶峰。现在西方人研究文革，就很难理解当初的许多细节——何以一个民族会整体可笑至此。

八

恐惧会使人变得可笑——这是我经历了铁窗生活后开始懂得的道理。

中国监狱至今保留的一个监规就是每天集合数次，每次点名前都要犯人高唱没有什么就没有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好。也许始作俑者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罪人的思想和行为。但多数囚徒——包含刑事犯——都是制度和教育的牺牲品，他们又怎能被这种陈词滥调所感化。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在今天的监狱，仍旧是文革恶习的最大保留地。一个犯人作错了事，管教会组织批判会，如果是被抓回的逃犯，则依旧要挂沉重的木牌，巡回批斗。犯人代代相传的批判稿，都是文革时代的拷贝。我们这个民族的司法者，多数都还是文革的过来人，他们岂不知那个时代的乖谬和荒诞，但却在方方面面传承着文革的衣钵，继续贯彻着那种愚蠢和搞笑。

今年夏天，我再次回到了我的故乡小镇。青石街换成了柏油路，老人多已作古，恩仇不复存在，连当日河山也难相认了。我忽然从一处断墙上，又看见几道斑驳字迹——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竟然再次惶惑不安。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仿佛又听见半夜的警报突然拉响，我弱小的身体在暗夜战栗，眼中又放射出恨的光芒。

原载作者自选集《尘世·挽歌》，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3月第一版。

【简讯】

《文革中的检讨书》在香港出版

丁 东

近日，香港新成立的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了史实编的《文革中的检讨书》，内收刘少奇、王光美、邓小平、陈毅、李先念、陈丕显、曹荻秋、王任重、陈再道等人在文革中的检讨书共 53 篇，不失为一本有价值的文革研究史料集。此前这类信息虽然有光盘存储，但印成纸质书籍还是第一次。

我读过之后，感到此书还有一些方面尚待提高。

其一，此书标为“编著”。其实除了署名刘石言的两千字的序言，后面的内容均属史料汇集，所以封面上标名某人编即可。

其二，收入的内容较为芜杂。例如朱德的检查，实际上没有内容，只有一两句转述；戚本禹的检查也只有几句转述。类似这种情况，没有搜集到完整的原文，不如不收。

其三，缺乏分类。从检讨的主体看，有高级领导人，有领导人的夫人、子女，有文革中群众组织的头头，还有中共北京市委、湖南省军区这样的单位；从检讨的对象看，有的是面对中央和中央领导人，有的是面对群众。分类是编辑工作的重要方法，分类得当可以体现编辑的史识。现在的格局，看不出编者的分析和思考。

大陆出版有关文革内容的书籍十分艰难。在香港注册这样一家以文革历史为特色的出版社是一件好事。希望这家出版社不断提升学术水准，多出一些能够推进文革研究的好书。

【简讯】

《李作鹏回忆录》在香港出版

穆 汀

《李作鹏回忆录》这个月在香港问世。全书分上下两卷，共 9 篇 50 章。上卷讲述作者从 1930 年参加红军到 1950 年解放海南的经历，下卷讲述了作者后半生的遭际遇，其中涉及了中共党史、军史上的重大事件。如：批判罗瑞卿、

青海流血事件、五·一三事件、七·二〇事件、杨余傅事件、庐山会议、批陈整风、毛的南巡讲话、九·一三事件等。

此书是继《吴法宪回忆录》、《邱会作回忆录》、邱会作父子的《心灵的对话》之后的关于林彪事件真相的重要著作。它的问世，为当代国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对文革史的研究意义巨大。

此书正文 940 页，由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上下两册售港币 218 元。

【编读往来】

1、肖颖平向任冬林致敬

收到“拾荒者”专辑这一期，一口气读完，心潮难平。任冬林先生做的事太值得称道了！这就是鲁迅所说的中国历来有为民请命的人……那类“民族的脊梁”。我想，目前在民间这样默默地做着抢救性工作的人是不不少的，只是有的还暂时不为人知罢了。向任冬林先生及其他“拾荒者”们致敬！

2、魏波称赞“拾荒者”专辑

感谢你们编出这样一期别具特色、令人耳目一新的专辑。历来提到文化大革命，往往只是高层权力斗争，或者就只是红卫兵如何如何，很少有人关注到底层民众在文革中是如何生活的，他们当时的生存状态到底是怎样的。

我特别注意到这一辑中除富农外基本上地、反、坏、右这几类“分子”的交代都有了，这些交代材料原汁原味地再现了当时底层弱势群体的思想面貌及生存状态。仔细读来，会有许多感悟。这是一些很好的研究素材。任先生把它们抢救、发掘出来，真是功德无量。